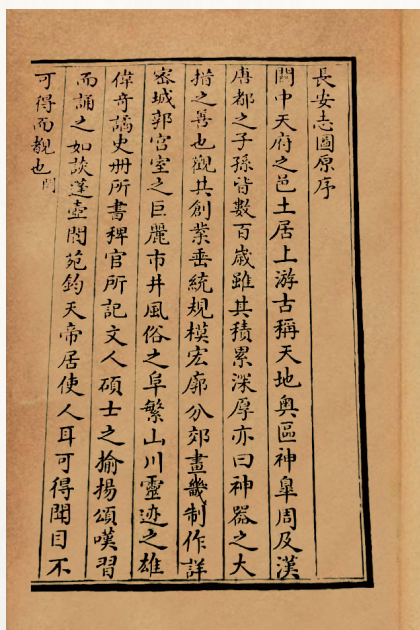


西安地方志

2017年 第六期 (总第249期) XI'AN DIFANGZHI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主办



10月20日，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在全市范围内组织讲好西安故事调讲会。西安市地方志办副主任姚敏杰、张帆，副巡视员王莹及各处室负责人、区县相关人员近30人参加本次活动，调讲会由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张帆主持。



参赛选手演讲



11月20日，市志办与市科协、市地震局共同举办十九大精神宣讲报告会。

市志总编室组织开展集体审稿。



12月4日，长安文化研究中心专家学者莅临市地方志办公室，双方交换成果，讨论合作事宜。

目 录



2017年第6期
(总第249期)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发送对象：

《西安市志》《西安年鉴》承编单位，地方志系统单位、本单位职工及撰稿人等。

西安方志文献

- 03 | 《关中胜迹图志》
- 04 | 《西安府志》

史料钩沉

- 06 | 南北朝时期
建都长安的两个少数民族政权——北周
- 11 | 汉代长安城的桥梁
- 14 | 隋唐时期的关中漕运工程

学术交流

- 17 | 论抗战时期西北联大的传统文化教育/兰梁斌
- 23 | 刍议新时代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
——对高陵区继承和发扬
优秀传统文化的思考/白金刚

人物春秋

- 28 | 西晋时期著名文学评论家挚虞
- 30 | 毛泽东颇为赞赏的南北朝时期梁朝名将韦叡
- 34 | 全真教的创始人——王喆（王重阳）

西安风情

- 35 | 西安仰韶文化聚落遗址——杨官寨遗址
- 37 | 秦岭七十二峪之——辋峪
- 39 | 隋唐长安著名佛寺——庄严寺（木塔寺）

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

- 40 | 周至牛斗虎
- 42 | 古法斫琴



◎ 西安村落

43 | 白杨寨村

44 | 马腾空村

45 | 史家湾村

◎ 诗意长安

48 | 对雪（唐）杜甫

49 | 观猎（唐）王维

◎ 志鉴动态

52 | 市志办举行“坚定文化自信
讲好西安故事”调讲会

52 | 《西安年鉴2017》正式出版发行

53 | 《灞桥区志（1994—2010）》正式出版发行

◎ 字词文化趣谈之典出史籍

10 | 走马观花

16 | 与虎谋皮

51 | 螳螂捕蝉

◎ 文苑

54 | 古都新笔：《西安史话》/王茂林

55 | 阅尽西安春色——《西安史话》读后感/王启新

《西安地方志》编辑委员会

主任：姚敏杰

副主任：张 帆 王 莹

委员：崔义萍 杨军亚

高长安 姚文东

崔桂琴 王耀珍

高 鹏 郑红波

《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主 编：王 莹

副 主 编：高长安 宋亚颖

责任编辑：宋亚颖 闵莎莎

主办：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辑：《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地址：西安市凤城八路109号

市政府大院26号信箱

邮编：710007

西安地方志办公室：

<http://xadfz.xa.gov.cn/>

西安市地情资料数据库

[http://xadfz.xa.gov.cn/](http://xadfz.xa.gov.cn/difangzhinew/)

difangzhinew/

E-mail: changannan6861@

sohu.com

674292617@qq.com

电话：029-86788731



编者按：

西安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方志编纂在此同样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

地方志历经数千年岁月而经久不衰，虽然从形式到内容，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但其宗旨和基本功能却始终如一。这种世界上独有的民族文化现象，既根源于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需要，也根源于各个地域的人们对自身历史的重视、珍惜、自豪与反思。

“方志”得名，始于西周，《周礼·地官》有“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的记载，汉郑玄注曰：“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方志编修，自此承传不辍。历代帝王将相、州县主官，无不以修志为重要政务，竟至旧时民间有“七品县令三件事：收税、断案、修县志”之说。新官到任，首索志书，几成惯例，传为美谈。

古都西安，物华天宝，人文荟萃；历代方志，新编志书，莘莘大观。今天，中共西安市委、市政府在初步建成具有历史文化特征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关键时期，进一步提出了全力打造“品质西安”的奋斗目标。“品质西安”包含内容诸多，文化内涵是一个重要方面。为此，我们特开设“西安方志文献”栏目，连续刊登、介绍西安地域历代方志文献，以期使读者了解西安地域方志编纂的成就与历史，体味西安的内在品质；更为有兴趣和有志于西安地情研究的人士铺设一条连接历史与今天的小径，开启一扇立足今天而回望历史的窗口。

《关中胜迹图志》

《关中胜迹图志》 毕沅修纂，30卷。毕沅主陕期间，鉴于关中为周秦汉唐古都，留有大量古迹名胜，而存世之诸家撰述，如《三辅黄图》《西京杂记》及《长安志》《雍录》等“体例如殊，纯驳互见，披图按籍，牴牾实繁”，遂“询求旧迹，订讹厘舛”，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撰成《关中胜迹图志》30卷。四库馆在奉旨将此书录入《四库全书》时，将图集编为2卷，称32卷。此书“考据本末，荟萃诸书”，是研究关中历史、地理及文

物古迹，尤其是研究周秦汉唐史迹的重要文献，也是西安历史上的一部重要专志。全书结构以乾隆时陕西府州分篇，篇前有图，附以各府州疆域名胜图；篇后为志，各府州均系以地理、名山、大川（附水利）、古迹（附宫阙、苑囿、寺观、祠宇、郊邑、第宅）等4目。各卷内容为：卷一篇首为陕西省地理，次后至八为西安府；卷九至十四为同州府；卷十五至十八为凤翔府；卷十九至二十二为汉中府；卷二十三为延安府；卷二十四为榆林府；卷





二十五为商州；卷二十六为乾州；卷二十七为邠州；卷二十八为兴安州；卷二十九为鄜州；卷三十为绥德州。故此志名曰关中胜迹，实则

囊括陕西全省。全书附图61幅，其中西安府附有西安府疆域图、终南山图、鸿门图、楼观图、渭河图、泾河图、龙洞渠图、仙游潭图、灵台图、汉长安未央宫图、汉建章宫图、唐西内图、唐东内图、唐南内图、唐华清宫图、辋川图、韦杜二曲图、慈恩寺图、荐福寺图、南五台图、周文王陵图、唐昭陵图、灞桥图、金锁关图等共24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书以郡县为经，以地理、名山、大川、古迹四子目为纬，而以诸图附于后，援据考证，各附本条，具有始末。”《关中胜迹图志》有《四库全书》本、灵岩山馆刻本、镇洋经训堂刊本，今有三秦出版社2004年出版张沛点校本。

毕沅，江苏省镇洋（今江苏省太仓市）人，清代知名学者和乾隆朝重臣，乾隆二十五年（1760）状元。学术功力深厚，两次出任陕西巡抚。

《西安府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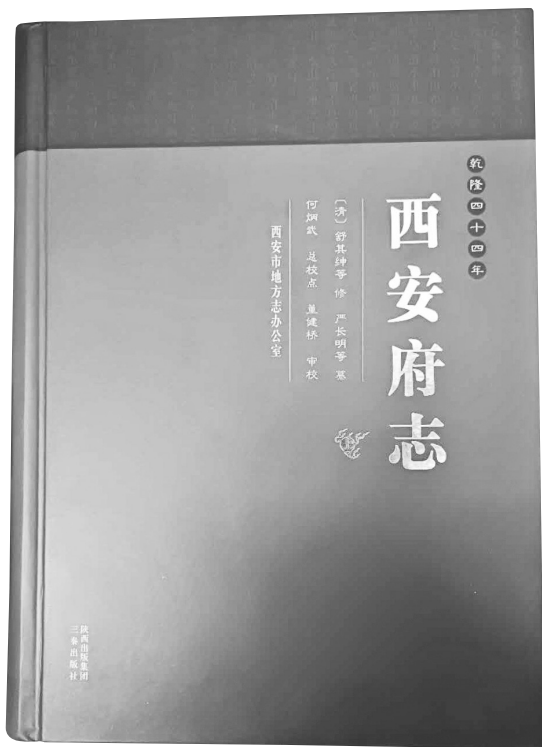
《西安府志》舒其绅修，严长明纂，80卷首1卷。该志乾隆四十一年（1776）始修，四十四年（1779）书成。全书分卷首、15门、51类、136目，100余万字。记述范围包括清代西安府所辖长安、咸宁、咸阳、兴平、临潼、高陵、鄠县、蓝田、盩厔、泾阳、三原、渭南、富平、礼泉、同官15县及耀州。卷首录清顺治、康熙、雍正诸帝王吟咏西安及关中山川名胜的诗及祭祀陕西诸帝王陵的祭文；卷一地理，包括疆域图及分野；卷二至四记述名山；卷五至八记述大川；卷九至十一为建置，分述各县城池、公署、镇堡、关津、驿传、营伍；卷十二至十八食货，分述各县历代蠲赈、户口（附力役）、田赋、积贮（附和余）、屯运、经费、课程、盐钱、茶马、物产；卷十至二十学校；卷二十一至二十六职官志，记述历代京兆尹、知京兆府、京兆府尹、知州、京兆郡太守、各郡太守、京兆少



尹、县令、参佐、刺史；卷二十七至四十人物，记述各县自周至清的儒林、文苑、隐逸、流寓、方技、释老、列女；卷四十一至四十五选举志，记述历代的征荐、诸科、进士、举人、武科、掾史、馆学生等；卷四十六至五十三大事志；卷五十四至六十五古迹志，分宫阙、苑囿、第宅、林垌、祠宇、陵墓；卷六十六至七十一艺文志，分述赋、诗、诗余、文，文中又细分诏文、敕、奏记、书、檄、议、策、说、论、对、序、记、诗赞等，辑录周秦汉唐以来古代长安涉及政治历史、风景名胜的名篇佳作诗文290余篇首，包括京兆府关于麦收、丁役、减免税收、赈贷百姓、救济饥民及时政的论述；卷七十二至七十三金石志，记述自秦至明代碑文石刻310多通，包括西安城内各地及碑林所藏碑石128通；卷七十四至八十拾遗志，其中又分地理、山水、建置、食货、学校、职官、人物、选举、大事、古迹、艺文、金石12门，记述长安方言、民风民俗，历代任职于长安及各县职官人物的历史故事，并辑录今已佚失的历代长安古都宫阙、街坊、人物、传说与异事等。

《西安府志》是清代西安惟一的一部府志，是“纂辑派”的代表作品。其所引用的资料，除《大清会典》《大清一统志》等14种御制、御定书目外，经史子集均有涉及，总数达千种以上，凡与西安相关的典籍文献“莫敢或遗”，并经严格考证筛选，广征博引，缜密辨析，历来受到历史、方志学界推崇。其主要特点：一是资料性强，尤其注重明清资料收录，食货、户口、田赋、徭役等均有统计数据；二是体例严密完备，列目详尽全面；三是收录人物众多，包括职官2936人，社会人物2009人，选举人物5491人，共计达10436人之多；四是收录不少其他文献所不载的内容。《西安府志》原刻本收藏于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等处。2007年《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一、二册收录此书。2011年，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整理校点，三秦出版社出版何炳武校点、董健桥审校校点本。

舒其绅，直隶任丘县（今河北省任丘市）人，乾隆四十二年（1777）任西安知府。严长明，江苏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人，清代著名学者、藏书家、文学家、金石学家。



南北朝时期建都长安的两个少数民族政权——北周

十六国时期，在长安建立了三个少数民族政权。而到了南北朝时期，又有两个少数民族政权建都长安，即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西魏和鲜卑族宇文部建立的北周。这里介绍北周。

一、宇文护专权，周武帝继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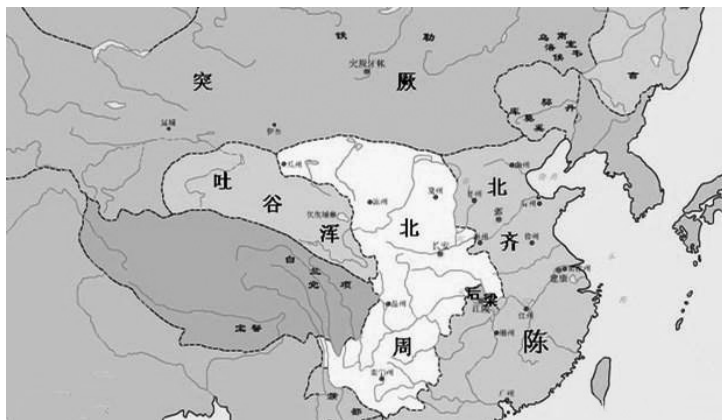
西魏政权的实际建立者与统治者宇文泰死时年仅50岁，他晚年一心效仿曹操，只想成为西魏政权的真正主宰，而不愿意废黜傀儡皇帝，自己承担奸贼的恶名，把废旧立新之事交给儿辈们去完成。但宇文泰唯一担心的是诸子皆年纪幼小，难以立即承担大任，在无奈之际只得托孤于比较年长的自己的侄子宇文护。临终之时给宇文护交代道：“吾形容若此，必是不济。诸子幼小，寇贼未宁。天下之事，属之于汝。宜勉力以成吾志。”

宇文护自青年时代起就追随宇文泰驰骋疆场，屡立战功，进封中山公，任大将军。宇文泰死后，时年41岁的宇文护就以顾命大臣的身份在灵前扶宇文泰第三子15岁的宇文觉承袭宇文泰生前的太师、大冢宰、安定公等职位。公元556年，宇文护逼西魏恭帝退位，立宇文觉先称天王，后即帝位，国号周，历史上称为北周政权。

北周政权建立之后，由于宇文觉年幼，宇文护以大司马、大将军和冢宰的身份辅政，在开国初期宇文护确实对稳定国家朝政，安抚庶民百姓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他在实际上操纵了国家政治军事大权后自恃功高，孤立皇帝，排除异己，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引起了太傅冢宰赵贵、太保大宗伯独孤信的强烈不满，密谋袭杀宇文护。结果被宇文护发觉，将赵贵处死，逼迫独孤信自杀，并下令凡参与者密谋者一律处以死刑。朝臣乙弗凤、李植、孙恒等人愤懑不平，规劝宇文觉约定日期召集各位公卿会宴，乘机除掉宇文护。在宇文觉犹豫不决之时，参与密谋的张光洛向宇文护告发了乙弗凤、李植、孙恒等人。宇文护大怒，派统率禁兵的尉迟纲入宫，抓住乙弗凤、李植、孙恒等人押送到宇文护府第，幽禁了宇文觉，召集公卿会于未央宫，宣布废掉宇文觉，拥立宇文泰的另一个儿子宁都公宇文毓继位，是为北周明帝。同时下令处死乙弗凤、李植、孙恒等人，毒杀了宇文觉，谥号为孝闵帝。宇文护被晋位为太师，其子宇文至被封为崇业郡公，继续把持朝政。

北周明帝宇文毓原为宇文泰庶长子，即位时年已22岁，史载他“宽明仁厚，敦睦九族，有君人之量。幼而好学，博览群书，善属文，词彩温丽”。宇文护上表请求归政于皇帝，北周明帝立即同意了他的请求，自己开始独立处理朝政要务。但军事大权仍然掌握在宇文护的手中，左右十二军的征调没有他的手令不得擅自行动。宇文护的府邸屯兵防卫，比皇

宫还要严密。实际上无论大事小事，都是由宇文护先行决断后再上报皇帝。宇文护心中惧怕北周明帝逐渐剥夺自己的权力，便暗中指使宫中膳部下大夫李安于公元560年下毒于糖饼中进献宇文毓，宇文毓食毕腹痛难忍，情知中毒，自思诸子年龄幼小不是宇文护的对手，便在临死之际颁下遗诏立自己第四弟、鲁国公宇文邕继位。宇文毓在位三年，死时年仅27岁。



宇文护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就废掉和毒杀了两个皇帝，使都城长安陷入恐慌和动荡之中。

宇文邕即南北朝历史上有名的北周武帝，小名罗突，于公元543年出生在关中渭水北岸的同州，小的时候就聪明机敏，深得父亲宇文泰的宠爱。宇文泰曾抚摸着他的头对群僚赞叹说：“成吾志者，必此儿也。”即皇帝位时年方18岁，但沉毅果敢，精明强干，很想有一番大的作为，当然不愿意皇权旁落。在即位12年后，即公元572年，宇文邕在都城长安发动了一次宫廷政变，亲手除掉了专横朝政的权臣宇文护，结束了北周朝政长期动荡不安的局面，把一切军政大权完全集中于自己手中。

二、实行政治经济改革，掀起“灭佛”运动

北周武帝宇文邕在中国历史上有“雄才大略”之称，为了实现消灭在北方与北周分庭抗礼的北齐政权、统一整个中原的宏愿，北周武帝进一步摆脱鲜卑旧俗的束缚，锐意革新，在关中及整个统治区大力推行多方面的改革。

在政治上，宇文邕以汉族传统的儒学思想作为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并仿照汉族先进的政治制度，进一步调整封建生产关系，几次颁发诏书，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释放奴婢，把他们全部变为农民，投入农业生产。这不仅解放了一大批劳动力，而且削弱了当时鲜卑贵族奴隶制残余形态，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在经济上，北周武帝巩固和发展均田制，调整国家赋税制度，减轻人民的经济负担。他还非常重视兴修水利工程，曾发动人力在渭水北岸的蒲州、华州兴建了两条灌溉渠道，引水灌溉几万顷旱田，极大地推动了关中地区水利事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军事上，北周武帝进一步打破汉族和鲜卑族之间的民族界限，大量招募汉族农民充当府兵，并且在各方面给予优待。这不仅大大加强了军事力量，而且进一步加速了鲜卑族和



汉族人民的融合过程，促使府兵制从原来的兵牧合一逐渐走向兵农合一。到了北周末年，50万府兵中有一半以上是汉族士兵。在府兵制基础上形成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日趋庞大，几乎囊括了鲜卑族所有大姓和关中著名汉族世家大姓，成为北周统治阶级的中坚和以后数百年间影响中国政局的核心力量。

北周武帝的另一项重大改革是废除佛教。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佛教空前盛行的时代，很多地方都大兴土木，广建佛寺，不少人“假募沙门，实避调役”，纷纷投身佛寺，削发为僧，致使佛寺和僧尼数量恶性膨胀。当时在北周统治区，就有一万多所寺院，100余万僧尼，僧尼数量几乎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仅在京城长安及其近郊就有寺院几百所，僧尼好几万人，这些寺院都广占田地，盘剥佃户。僧尼不从事生产劳动，逃避国家赋税兵役，成为社会上的寄生阶层，严重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加重了普通百姓的各项负担。北周武帝认为，要消灭北齐，就必须富国强兵；要富国强兵，就必须废除佛教。于是在建德二年（573）十二月，他亲自召集名儒、名僧、道士及文武百官二千余人在长安大德殿辩论三教优劣，当朝宣布以儒教为第一，道教为第二，佛教贬为末等。接着，北周武帝提出了“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的口号，下诏在全国范围内灭除佛教。勒令将境内所有的寺院及其土地和寺院财产全部没收入官，所有的铜铸佛像，钟、鼎、磬等佛教器物统统销毁以铸造铜钱和兵器；100多万僧尼一律还俗，受寺院盘剥的僧祇户全部编入政府户籍，开荒种地，从事农业生产。这就是南北朝历史上著名的“北周武帝灭佛”事件。

通过这项声势浩大的毁佛运动，沉重打击了僧侣地主的政治经济势力，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兵役来源，也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在灭佛过程中，有的僧侣威胁武帝，说灭佛死后要打入十八层地狱。武帝却淡然一笑说：“只要百姓能够得到快乐，我死后愿意受地狱的痛苦。”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北魏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周世宗）四次灭佛事件中，以北周武帝的灭佛最为彻底，成果也最大。

三、消灭北齐政权，统一中国北方

经过北周武帝的大力改革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在短短几年中，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北周的政治局势更加稳定，国力空前强盛，统一中原的条件日趋成熟。

与北周日益兴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北齐政权日益走向没落。北齐前后几个皇帝大都荒淫残暴，特别是末帝齐后主高纬昏庸腐败到了极点，他对朝廷的政事不闻不问，自号“无愁天子”，整天抱着琵琶弹唱“无愁曲”；又穷奢极欲，大肆搜刮民财，驱使人役修造华丽的宫殿，加剧了北齐境内的阶级矛盾。北齐的历代君主又非常仇视汉人甚至汉化的鲜卑人，齐宣帝曾一次杀掉汉化的鲜卑贵族七百余人，齐后主也滥杀汉人汉官。这种极端残暴落后的行为使北齐政权很快失去了汉族地主和大多数鲜卑贵族的支持，陷入极端孤立的地位，国势

更加衰弱。

北周武帝见消灭北齐、统一中原的时机已到，于是在外交上和军事上展开一系列积极活动。他多次派遣使者，北与突厥和亲，南和陈朝通好，争取到突厥和南陈与北齐断交，并约定南北同时出兵配合北周的军事行动。公元575年夏天，北周武帝亲自指挥18万大军，兵分几路东渡黄河，向北齐发动了强大的军事攻势。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北周军队就攻破了30多座城池，并团团包围了北齐重镇洛阳。但此时宇文邕却身染重病，北周军队只好撤围西归。

第二年秋天，大病初愈的宇文邕再次指挥14.5万人马出征伐齐。这次他采取避实击虚的战略方针，不从北齐重兵防守的东路进攻，而是挥军北渡黄河，直捣北齐重镇晋阳（今太原市）。公元576年十二月六日这一天，北周军队与北齐仓皇调集的10万大军在平阳（今山西临汾市）城下展开最后决战。结果北齐军队大败，四散溃逃，丢弃的军资甲仗堆积如山。宇文邕率军乘胜追击，连克晋阳和北齐都城邺城，齐后主高纬在逃跑途中被生擒活捉。经过将近两年的战争，北周终于消灭了北齐政权，统一了整个北方地区。

四、北周武帝病死，杨坚代周建隋

北周武帝灭齐之后，把在关中实施的各项改革政策推向关东，力行均田制和府兵制，开始了统一天下的征程。他在灭齐后不久既派大军攻伐南方的陈朝，一举消灭陈朝主力三万余人，夺得了淮河以西地区。公元578年五月，为了消灭北方日益强大的突厥族政权，解除南征的后顾之忧，北周武帝亲自指挥五路兵马大举北上，并征调关中各地的公私车马随军运送粮草。但当大军行进到今淳化县境的时候，北周武帝旧病复发，不能行动，只好下诏罢北征之兵。六月，北周武帝病逝于从淳化返回长安的路上，终年仅36岁。北平突厥、南定江南、统一天下的宏大志愿也随着他的逝世而宣告夭折。

北周武帝死后，其子宇文赟即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荒唐皇帝——北周宣帝。宇文赟在为东宫太子时就以生性顽劣、嗜酒如命而出名。而北周武帝又是一位严父，恨铁不成钢，曾下令禁止任何酒酿入东宫，当宇文赟犯错时动辄施以家法，鞭杖交加，并以废掉太子之位相威胁，企图逼其改过自新。吓得宇文赟见父亲时如同老鼠见了猫一般恐惧，不得不将顽劣本性深深掩藏。他继位之后自以为父亲死后再也无人管得了他，便本性暴露无遗，胡作非为，无法无天。他打破了前赵皇帝刘聪“三后并立”的历史纪录，最后甚至立了五位皇后。即位第二年即觉得做皇帝国事繁冗，不能尽情享乐，让位给7岁的儿子宇文阐（北周静帝），自己做起了太上皇，自称天元皇帝，住处称为“天台”，对臣下自称为“天”。大象二年（580），年仅22岁的宇文赟因纵欲过度病死宫中，遗诏随国公杨坚辅政。

杨坚原为北周八柱国之一，承袭父亲杨忠随国公之位，是周宣帝皇后杨丽华的生身父亲。在宣帝死后遂以皇太后的父亲、皇帝宇文阐（死后被谥为静帝）的外公、左大丞相身份





辅政，独揽了军政大权。北周宗室赵王宇文招、越王宇文盛等五王见皇室大权旁落，自然不服，密谋铲除杨坚，被杨坚一一诛杀。上柱国之一、象州总管尉迟迥起兵反抗，被杨坚发兵平息。公元581年，杨坚逼迫自己的外孙北周静帝退位，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隋，建国历时20年的北周政权至此灭亡。

作为南北朝时期建都长安的最后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北周继承并发展了西魏以来的各项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为关中地区的经济崛起和民族融合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消灭了北齐政权，统一了中国北方，为隋文帝杨坚以后南下灭陈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因而在中国古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北周武帝宇文邕葬于孝陵，其址史书记载不祥。1993年今咸阳渭城区底张镇陈马村东南一古墓连遭盗掘，考古部门此后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大量文物。根据发掘的墓志铭及一皇后玉玺上所刻文字来看，此墓正是北周武帝宇文邕与其皇后阿史那氏合葬的孝陵。北周其他皇帝的陵墓则不可考。

（摘自《西安通史》）

字词文化趣谈之典出史籍

走马观花

解释：走——跑。骑在跑着的马上看花。比喻匆忙、粗略地观察了解。

成语出自宋·杨万里《和同年李子西通判》：“走马看花拂绿扬；曲江同赏牡丹香。”

唐朝著名诗人孟郊，与贾岛齐名，人称“郊寒岛瘦”。相传，孟郊小时候家里很穷，但他很有才华，学习也非常刻苦。长大后，他的诗作得很好。可是，他考试当官的路却走得相当坎坷，连续参加了好几次考试，都未能考中。

功夫不负有心人。孟郊四十六岁（一说四十五岁）时，终于考中了进士。几十年的读书当官梦终于实现了，孟郊非常高兴。他迅速穿上新衣，骑上马，在当时的京城长安尽情地游玩。玩到高兴时，他不由自主地取出笔，很快就写成一首叫《登科后》的诗。

诗中写道：“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意思是说，过去那种贫穷的生活实在没有值得夸耀的，今天我中了进士，才真正感到皇恩浩荡。我很高兴，马儿也跑得飞快，一天就把长安城的美景全都看完了。

“走马观花”的成语由此引申而来。



汉代长安城的桥梁

“八水绕长安”和环城而建的护城河，给西汉都城长安带来了丰富的水利资源，使这座古代著名的大都市增添了灵气与活力，但也给交通出行带来了许多麻烦与不便。于是陆路交通系统中借以跨越河川险阻的建筑形式——桥梁便在长安城四周建立发展起来，并与高大的城墙、雄伟的城门一起构成长安城坚固的防御体系。据史书记载，汉代长安城共有16座桥梁，其中12座桥梁与12座城门相对应，建立在护城河上。长安城北以滔滔东去的渭水为天堑，渭水之上架有3座桥梁，这就是秦、汉、隋、唐诸朝名闻天下的东渭桥、中渭桥、西渭桥了。还有城东的灞桥虽然距离城门较远，却为长安城防御体系中至关重要的安全屏障。

渭河三桥之中的东渭桥位于长安通向关东的大道上，是沟通长安与广大东方地区重要通道。汉代的东渭桥故址位于今高陵县以南的灞河和渭河交汇处，建于汉高祖刘邦时期，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长安与刘邦当初定都关中的临时都城栌阳的联系。汉文帝刘恒从山西北部的代国启程赴长安即皇帝位，长安城中的文武官员就是集合

在这里迎接的。

渭河三桥中以中渭桥建造时间最早，地位也最为重要。此桥为秦昭王时始建，秦始皇时扩建，汉代予以重修，称为“横桥”或“横门桥”，故址在今西安市草滩农场，距离现在的渭河河床较远，其原因在于历史上渭河不断北移的缘故。据《三辅黄图》记载，这座桥“宽六丈，南北长三百八十步，六十八间，七百五十柱，一百二十二梁”。说明这座桥是多跨梁式桥，汉代的六丈约合今13.8米，这个数字与我国现代大中城市4车道城市桥约15米的宽度已相当接近。中渭桥桥之南北有堤防，桥头立有华表，桥身宽长壮观，桥面巍峨高耸，确实有“横桥飞渡、以象天汉”的恢弘气势。因此一些重大的政治典礼活动有时候在此桥举行。比如汉宣帝时就曾登临此桥，迎接匈奴使者并接受群臣的朝贺。《史记》中曾记载汉文帝驱车行经渭桥时，突然有人慌慌张

张地从桥下跑出，致使驾马受惊失控。文帝大怒之下命令将其收捕，交掌管刑狱的廷尉张释之严加审理。张释之审讯后得知所谓罪犯只不过是一个过路



渭桥发掘场现场





平民，因皇帝出行道路戒严躲藏在桥下，等候了一段时间，以为皇帝车队已经驶过，便跑了出来准备回家，没想到刚一出来，却冲犯了皇帝的车驾。张释之仅以他违犯戒严令的罪名处以罚金后释放。汉文帝以为处罚太轻，认为应处以死罪。张释之据理力争，最后说服了汉文帝同意了自己的判决。这一秉公执法的故事，就发生在中渭桥上。桥下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说明由于河滩平阔，当时修建了长长的引桥。中渭桥梁其他结构中很可能也使用石材。公元前91年长安“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调查清楚后，汉武帝下令将陷害太子的主谋人之一苏文处以火刑，活活烧死在横桥上，如果此桥纯系木结构建筑，显然经不住大火焚烧的。公元前86年，由于大雨导致渭河暴涨，中渭桥被冲毁，不久又重新修复。

西渭桥最初建造于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在此前一年汉武帝开始在长安城西35公里处营筑自己的陵寝茂陵，要经过渭河运输大量的人力与建筑材料，如果出横门过中渭桥，就绕了很长一段路程。于是汉武帝下令在中渭桥以西兴建了一座新桥，直接通向茂陵。这座桥梁被称为西渭桥，又因其与汉长安城便门相对，故又被称为“便桥”或“便门桥”。西渭桥故址位于今咸阳市秦都区碱滩农场附近。此桥建成之后由于近达茂陵、雍城，远通河西走廊，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与中西文化交流的频繁，作用日显重要，成为长安通向西方的咽喉要道。

2012年，考古工作者在汉长安城北边发现了迄今最大的秦汉木梁柱桥梁遗址。经调查、勘探和发掘确定，目前在未央区六村堡街道西席村北、未央区汉城街道高庙村北农田

中，至少有2组5座桥梁。其中位于西席村北的古桥，因正对汉长安城北墙中间城门厨城门，故称“厨城门桥”，在该处共发现4座桥梁，其中位于中间者为厨城门一号桥，一号桥向西约200米为二号桥，向西80米左右为四号桥，一号桥向东约200米为三号桥。位于高庙村北的古桥，因正对汉长安城北墙洛城门，称“洛城门桥”。考古工作者将发现发掘的这些位于汉长安城北横跨渭河的桥梁统称为“渭桥遗址”，被评为201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厨城门一号桥，横跨于渭河之上。桥梁东西两侧桥桩之间的宽度约为15.4米。桥梁南北长度约880米左右。桥桩残长约6.2—8.8米，也是将桥桩底端削出长约1米以上的三角锥形楔于河床。桥桩顺河流方向东西排列，间距不等，南北两排桥桩间距约3—7米。多处发现有粗细不等桥桩密集成堆的现象，而且还发现一些桥桩开口高度相差达2米左右，说明此桥使用时间较长，历经多次程度不同的维修和续建。厨城门三号桥西与厨城门一号桥相距约200米。发掘确定，该桥为南北向木梁柱桥，其东西两侧桥桩之间宽约8.3米，南北两列桥桩之间间距约6—7米。

洛城门桥向西与厨城门桥相距约1700米左右，也是南北向木梁柱桥，东西两侧桥桩之间宽约15米，已发现东西3排桥桩，相邻两排桥桩间距约9—10米。

渭桥2组5座桥梁遗址的发现，说明汉代长安所建桥梁数量远远不止史书上记载的16座桥梁，因为今天考古发现的很多桥梁其名目与史书记载的桥梁名称无法对应。而这些桥梁的规模、形制、材料与坚固程度，均体现了汉代



领先于当时世界各地的桥梁建筑技术与水平。特别是厨城门一号桥体量巨大，是已知同时期世界上最大的木梁柱桥，是丝绸之路从汉长安城出发后的第一座桥梁。渭桥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不仅填补了汉长安城北渭河古桥考古的空白，也填补了桥梁学研究的空白。

横跨灞河的灞桥是长安与东方广大地区的重要通道，也是长安城东部的重要屏障，如果灞桥失守，长安城以至于整个关中就门户大开，再也没有什么障碍了。因此秦末刘邦率军过武关经蓝田突然出现在灞上，秦王子婴顿时惊慌失措，感到大势已去，只得率领咸阳文武百官跪降于轺道。后来项羽率军进入咸阳，实力弱小的刘邦宁肯让出咸阳，也要固守灞上，实际上扼守了关中通往东方的咽喉。西汉中央政府专门在灞桥驻有军队，设置里亭，加强交通管制，强化治安管理。这里绿柳成荫，风景优美，汉代长安人送别东去的客人，往往在此停住脚步，折柳赠别，这一习俗一直沿袭到了隋唐时代。灞桥之柳，在中国古代成为寄托离情与乡愁的象征。王莽地皇三年（22），灞桥发生火灾，数千人抢救不及，灞桥终于焚毁。后来调查失火的原因，据说是由于寄居在桥下的贫民生火取暖不慎造成火灾。由此可见灞桥也有引桥。王莽在灞桥被焚毁之后不久就重新予以修复，并命名为“长存桥”。

汉代长安的桥梁，在汉长安城遗址西面也有惊人的发现。1989年11月，在咸阳市钓台乡五道村附近发现两座汉代桥梁遗址。其中一座桥址16排112根木桩，每排间距3—6米。已露出的木桩高1.6米，直径约40厘米，上端残缺不全，有火烧痕迹。根据研究，当时桥面宽16米左右，为榫卯结构，但今天已不复存在。

桥南端发现面积约8平方米大型铁板6块。据测定，此桥距今已2100余年，属于汉代建筑，也是目前国内外迄今发现的年代最久远、规模最宏大的木结构桥梁遗址。另一座桥梁位于此桥东300米处。发现15排41根木桩，排距8米左右。露出的木桩高2—3米，并发现有9.54米方形大梁一根。桥面宽度及结构均与西面的桥梁相同。从残瓦等物和两桥风格基本相同的特点分析，认为可能是另一桥烧塌后的重建桥，重建时间已在西汉时期。有的学者认为此桥是汉代帝王狩猎游乐的上林苑内的泮河桥，故称为泮河古桥。

2006年，在西安市未央区三桥镇湾子村东北300米处，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一座汉代木结构桥梁遗址。楔入河床的木桩共5排160根，这些木桩根根挺立，基本处在原始位置，多为木质坚硬的黄杨木、香樟木、楠木等珍贵木种。木桩下部削为三棱锥形，非常尖利，采用夯打的形式深深楔入河床。桥宽50米，长300米，为目前国内发现的规模较大、时间最早、建筑材料最为珍贵的古代桥梁遗址。根据研究，此桥位于汉长安城西南角处约300米，介于长安城与建章宫之间，很可能是西汉时期修建于滴水之上的由长安城通向上林苑的皇家桥梁。

综合史书记载和考古发现，说明汉都长安作为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闻名世界的大都市，水陆交通十分发达，道路桥梁密如蛛网，通向四面八方。总之，无论从布局规模、居住人口还是建筑水平、基础设施来看，汉代的长安城都是当时世界上位居一流的大都市。





隋唐时期的关中漕运工程

隋唐定都长安后，政府运转要求解决赋调租粮的运输问题，市场交易依靠大量物资集散，京师人口需要稳定的粮食供应渠道，以畜力和人力为主的运输方式远远不能满足京城日益增长的各种需求，借助水力的漕运就成为提升运力的关键所在。

史载隋代“户口岁增，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运输繁重不说，效率也偏低，日夜兼运，还要持续数月。针对此种现状，有识之士提出对策，据《册府元龟》卷四九七《邦计部·河渠二》记：

初，帝每忧转运不给，柱国于仲文请决渭水，开渠漕，帝然之。使仲文总其事，又命郭衍为开渠漕大监，与宇文恺部率水工凿渠，引渭水经大兴城北，东至于潼关，漕运四百余里。关内赖之，名曰富民渠（一云广通渠）。

此项工程由于仲文提议，经隋文帝批准，以郭衍为开漕渠大监，实际上由著名工程建筑家宇文恺主持开凿。工程其他情况如何？诸书语焉不详，据《隋书·高祖纪》开皇四年（584）六月，“开渠，自渭达河，以通运漕。”到九月，“幸霸上，观漕渠，赐督役者帛有差。”可知漕渠自六月开工，到九月完成，工期仅3个月，可谓神速。值得一提的是，漕渠长度出现不同的记载，如《隋书·食货志》记：“命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赖之。”同是广通渠，同样由宇文恺主持，前记400余里，此处却记为300余里，略有出入。不仅漕渠长度记载存在差异，甚至漕渠名称也有多种，如前引资料把隋代漕渠或称为富民渠，或称广通渠，也有别称者，如《长安志》记：“永通渠，隋开皇四年开，起县西北渭水兴城堰，初名富民渠，仁寿四年改。”记载了仁寿四年改富民渠为永通渠之事。此外，还有富人渠的称法，《北史·郭衍传》：“征为开漕渠大监……名曰富人渠。”史念海曾经注意到漕渠之名尚有富民渠、广通渠、永通渠、富人渠之称，认为永通渠是避隋炀帝杨广之讳，富人渠是避李世民的讳，可谓确当之论。

参加漕渠开凿工程之人数已无法确知，就连工程管理者也无从详考，除上述于仲文、郭衍、宇文恺3人外，成千上万的人曾经为此项工程贡献力量，如今都变成了无名英雄，只有为数很少的人被记载下来，如史载元晖曾监漕渠之役，苏孝慈有督决渭水为渠以属河之役，元寿也曾参督漕渠之役等。或言监漕渠之役，或言督漕渠之役，证明他们也是工程的

参与者。此外，薛回曾领漕渠监，和洪任漕渠总管监，特别是新出土《隋郭均墓志》记：“（开皇）四年，领开漕渠总监……三月即成。”志主郭均也是开漕渠的参加者，其职名与元暉等人对照，少了监、督之词；与薛回等人相较，少了监、领之语；与开漕渠大监郭衍等相比，均有“开漕渠”之字，也许实际工程中就有开凿和监督的区分。

据研究，隋漕渠基本因袭汉漕渠的路线，只有在渠首和渠尾略有变动，持续使用了30多年。唐朝建国后，“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时，用物有节而易贍，水陆漕运，岁不过二十万石，故漕事简。自高宗已后，岁益增多，而功利繁兴”。随着漕粮每年由20万石增加到百余万石，关中通漕就势在必行。到唐玄宗时，出现两位漕运能人，一是裴耀卿，一是韦坚。裴耀卿以分节转输法解决了关东的漕运问题，3年漕粮700万石，但关内问题却成为瓶颈。水陆运使韦坚敢于担当，决心解决关内运输难题，“引浐水开广运潭于望春亭之东，以通河渭。”韦坚如何沟通河渭？此处言之不详，《旧唐书·韦坚传》记：自西汉及隋，有运渠自关门西抵长安，以通山东租赋。（韦坚）奏请于咸阳拥渭水作兴成堰，截灞、浐水傍渭东注，至关西永丰仓下与渭合。于长安城东九里长乐坡下，浐水之上架苑墙，东面有望春楼，楼下穿广运潭以通舟楫，二年而成。坚预于东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潭侧，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广陵郡船，即于楸背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船，即京口綾衫段；晋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綾绣；会稽郡船，即铜器、罗、吴綾、绛纱；南海郡船，即玳瑁、珍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纸笔、黄连；始安郡船，即蕉葛、蚺蛇胆、翡翠。船中皆有米，吴郡即三破糯米、方文綾。凡数十郡。驾船人皆大笠子、宽袖衫、芒屨，如吴楚之制。……至（望春）楼下，连檣弥亘数里，观者山积。韦坚在汉隋漕渠遗迹的基础上重新开通运漕，西起兴成堰，过浐水、灞水，直到永丰仓（隋名广运仓，避隋炀帝讳改此），使得关内漕运能力增强，特别是他还聚灞水而成广运潭，导演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庆功会，“天子望见大悦，赐其潭名曰广运潭。是岁，漕山东粟四百余万石。自裴耀卿言漕事，进用者常兼转运之职，而韦坚为最”（《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一年能运输400万石粮，创下隋唐关内漕运的最高纪录。

韦坚漕渠在使用30余年后丧失航运能力，一方面因为“浐灞二水会于漕渠，每



连线长安城与渭河的广通渠





夏大雨辄皆填淤，大历之后，渐不通舟。”另一方面，是社会动荡造成了疏浚不及时，导致漕渠转运功能低落。直到唐文宗时，再一次将开凿漕渠提上日程，时任宰相的李石于开成元年（836）奏开漕渠，提到：

咸阳令韩辽请开兴成渠。旧漕在咸阳县西十八里，东达永丰仓，自秦汉已来疏凿，其后堙废。昨辽计度，用功不多。此漕若成，自咸阳抵潼关，三百里内无挽车之勤，则辕下牛尽得归耕，永利秦中矣。（《旧唐书》卷一七二《李石传》）

唐文宗君臣不顾国力衰微，坚持开漕通舟。正是因为有汉、隋和韦坚的漕渠旧迹可以利用，故有“用功不多”之说。文宗力排众议，通过开漕通运的请求。“堰成，罢挽车之牛以供农耕，关中赖其利”。这是唐朝第二次开通漕渠，也是西汉以来的第四次。不断重复的漕渠工程是在反复强调漕运对于都市的不可或缺，也用另一种方式提醒后人水利工程是重要的，维护与管理更为重要。

字词文化趣谈之典出史籍

与虎谋皮

解释：谋——商量。跟老虎商量要剥它的皮。比喻跟恶人商量要他放弃自己的利益，绝对办不到。

成语出自《太平御览》引《符子》：“欲为千金之裘而令狐谋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与羊谋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于重丘之下；羊相呼藏于深林之中。”

古时候，东周地方有一个人，特别爱穿皮衣，爱吃珍异的美味。

有一次，他想弄一点美味的羊肉作祭品，于是便跑到山上，跟一只又肥又大的绵羊商量：我想借你身上的肉去祭神，你肯吗？这只绵羊一听，吓得咩咩叫着跑进密林深处躲藏起来。这个人只好两手空空地回家去了。

又过了些时候，他又想做一件价值千金的狐狸皮袍子，就跑进深山老林里，找到一只狐狸，跟它商量：你能不能把皮剥下来，给我做一件皮袍子呢？这只狐狸一听，吓得掉了魂，掉头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这个人只好叹口气，又无可奈何地回家去了。

后来，人们把这个故事演化成与虎谋皮这个成语。现在多用来比喻跟所谋求的对象有利害冲突，绝不能成功。





论抗战时期西北联大的传统文化教育

兰梁斌

抗战时期组建的西北联大，自觉推进教育与抗战建国相适应，运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培养学生的个人道德，增强民族自信、爱国精神。联大的传统文化教育贯穿在学校的办学理念、课程设置、科学研究、课外活动中，形式丰富。通过课堂教学、学术讲座、课外考察、纪念活动等方式，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之一。联大学生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培养下，形成了天下为公、不诚无物、勤奋敬业、质朴务实的优良作风和品格。西北联大的传统文化教育反映了大学是优秀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对于完善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中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具有启示意义。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为延续民族文化命脉，保存高等教育力量，国民政府提出“战时应作平时看”^[1]的教育指导方针，实施高校内迁战略，组建了西南联大、西北联大等高校联合体。西北联大在西北地区生存达八年之久，立于民族危亡时期的西北联大，自觉适应抗战建国要求，大力运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培养学生的个人道德，增强民族自信、爱国精神。联大的传统文化教育贯穿于学校的方方面面，在其熏陶和培养下，学生形成了优良品格，展现了高等教育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紧密联系。西北联大的传统文化教育向我们深刻地展示了离开民族传统的大学就如无源之水，同时也反映了大学具有传承、实践、创造文化的重要功能。这些经验对于完善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中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具有启示意义。

一、以优秀传统文化激扬抗日爱国精神

抗战时期，面对深重国难，联大师生清醒地认识到“教育需要与抗战建国政策相适应”^[2]。他们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不计小我，自觉追求民族独立与自由，主动“将国家政策，注入在教育精神里面去”^[3]，将救国图存、反抗侵略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高度的爱国精神是西北联大重要的文化传统。而通过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学生的爱国精神和民族自信心，是其重要举措。1938年，黎锦熙、黄国璋二位教授非常赞同“教育部”提出的在教育中研究光大中国固有文化，以培养民族自信心，并提出重编教科书来促进传统文化学习。他们深知民族自信的培养对抗战胜利的重要意义。

1939年，为从精神上确立民族至上目标，鼓舞师生积极抗战，联大常委胡春藻（又名庶华）在纪念孙中山时提出“救国之道德”，这种道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他指出：“今日中国之需要者，为攘寇患以救国家，所以今日要全体国民力求实践之同一道德，这种救国之道德，实为吾先民所固有，也就是总理所提倡之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通过传承优秀传统道德精神，鼓舞学生“养成整齐、清洁、勇敢奋斗的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与个人自强的信心”^[4]，为抗战胜利奠定精神基础。当然此处的忠孝并非过去的愚忠愚孝，而是“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一致笃信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是以吾人今日行孝之对象，应为整个之





民族。应求不辱吾民族共同之祖先……牺牲一己以维护民族之生存，自必引为人人最高之责任”^[5]。联大常委徐诵明也强调通过历史文化教育来激扬学生的民族精神。

1943年，《西北学术》月刊创刊时，校长赖琯指出：“我们要恢复历史的光荣，创建新兴的文化。”当时历史系在阐述培养目标时，指出既要造就研究史学之专门人才，“养成一般历史课程之师资”，还要通过史料研究，“提高民族自信精神”^[6]。可见在西北联大，通过历史文化激扬学生的爱国精神已形成共识。在这种文化熏陶下，培养的学生品格独立，如旅台校友于正生回忆道：“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母校毕业出来的校友，大半都是保有中国传统文化浓厚色彩，而富于应付艰苦环境具有坚强战斗力的中年人士。”^[7]

二、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办学理念

西北联大重视文化传承，自觉将传统文化精髓融入到办学理念中，突出表现于校训校歌上。

作为理念形态的文化，校训是一所高校办学理念的核心，学校精神的浓缩，能够引导、凝聚师生。校训制定需结合历史文化、时代精神、学校特色等综合考量，能够反映学校的品格。1938年10月19日，联大举行第45次校常务委员会会议，决议将“公诚勤朴”作为校训，并制成匾额，悬挂礼堂。黎锦熙解释，“公”是天下为公，“诚”是不诚无物，“勤”是勤奋敬业，“朴”是质朴务实。校训体现了传统文化精髓与时代精神的融合。他指出“西北之华山汉水，即‘华夏’之名所由来，古代文化实肇此土”，因此应继承“西北固有优良之民性风习”，如“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勤以开源，朴以节流，公以去私，用绝党争，这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精神^[8]。但校训来源于传统，并不等于复古，而是要体现时代精神，“然若徒珍故物，发思古之幽情，不计神州奥区，实赖物质交通而开发，则荣誉虽存于往史，今终无以解于落后之谓也”，因此应“以继往开来为务”^[8]。近代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就是“贫、愚、私、弱”，西北地区尤其严重。联大所在的汉中城固，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经济发展落后，文化水平低下，而“公诚勤朴”，正是对症下药，希望通过发扬这些精神，营造积极向上的校风，进而影响民风。

校歌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校歌歌词是学校展示办学历史和传统，鼓舞全校师生，加强凝聚力的重要内容之一。联大第45次校常务委员会会议聘请国文系主任黎锦熙和法商学院院长许寿裳撰

写歌词，其中写道：“华夏声威，神州文物；原从西北，化被南东。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8]，表达了传承悠久文明，发扬民族精神的办学愿景。联大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充分体现了传承创新优秀文化的努力，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就是鼓舞师生抗日爱国的信心与动力，胡春藻指出：“校训校歌之制定……务使抗战教育之精神随抗战生活而孟晋。”^[9]满足抗战需要始终是西北联大的根本战略。

三、课程设置中的传统文化教育

在课程设置中，联大专门开设了有关历史文化类课程，加强传统文化教育。主要体现在：

（一）开设共同必修传统文化课程

1938年10月5日《西北联大校刊》刊登了《颁布文理法三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训令》，指出各大学课程“自行规定，得因人地之宜，自由发展，惟以缺乏共同标准，遂致科目互异，程度不齐，未能发挥大学教育一贯之精神，而若干大学，分系过早，各系所设专门科目，又或



流于繁琐，一般学生缺乏良好之基本训练，所得知识难免支离破碎，不能融会一科学术之要旨，亦非培养高深学术人材之道”。据此情况，厘定颁布了三学院共同必修科目。其中作为传统文化重要内容的“国文”“中国通史”都是必修科目，各占6学分，学分比重很高。师范学院规定的各系共同必修课程中，“国文”“本国文化史”共计14学分，占总学分1/3，同样重视传统文化学习。1938年11月28日，联大举行总理纪念周，教务主任张贻惠要求全体一年级学生，必须订定“共同必修科目”，以让学生了解历史文化。

（二）写作“修养日记”“读书札记”

联大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品格修养，胡春藻指出：“伟大事业的成就，基于伟大人格之养成。所谓伟大人格就是打破个人利害观念，看透生死关头，临难不苟，见死不惧，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泰山可移，志节不变……青年勤求学问，若不注重人格之修养，犹之猛虎传翼，终为人类之害。”^[10]联大采取的方式是要求全校一年级生写作“修养日记”及“读书札记”。日记要求每天睡前写完，内容是“对于自己生活之反省与认识为主旨”^[11]。重视道德反省是儒家的重要特征之一。学生写作“修养日记”体现了对儒家传统的传承，反映了时代要求，学生每日深刻反思个人“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有否与抗战工作有关系，必须如此，才不愧为大学生”^[12]。读书札记主要内容涉及诸子、佛书、道教、说文、字典、音韵、国语、人物传记及考古学等传统文化内容。

此外，联大还直接运用优秀传统道德来教育学生。1938年12月25日，教育系导师在与学生谈话时，指出“品格的修养，比什么都重要。其实品格的修养，在中国古代也异常重视，如孔子所谓‘德行颜渊闵子骞……’可见地无中外，对于学生的训练，莫不以品格为第一”^[13]。12月26日，胡春藻在对师范学生演讲时，多次引用孔孟思想要求学生注重道德修养，指出“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如学问道德气魄不能达到一定程度，毕业要做一个优秀教师是不可能的。师范生须有“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和“知足不辱，知耻不殆”的修养，在教师岗位上，“和易近人，诲人不倦”“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给学生带来快乐，“传道授业解惑”“顶天立地做人”。

四、重视传统文化研究

联大师生注重运用科学方法研究传统文化。1938年，黎锦熙、钱玄同在为国文系拟定科目表时，提出要“培养学生用历史的态度与科学的方法研习中国古今语言文字，各体文学作品及各家著述，以解决今后国文的新趋向之能力”^[14]。同年，黄国璋提出应在科学方法指导下发扬中国固有文化。李书田也提出要“以科学方法发扬中国固有文化”^[15]。所谓科学方法就是近代在西学影响下形成的研究方法。联大的学术精神紧跟时代潮流，师生在其指导下，取得了大量的传统文化研究成果。

一是考古研究。历史系何士骥、周国亭等发掘张骞墓，研究张骞通西域，考察汉中地区诸葛武侯遗迹，取得重要成就。历史系黄文弼在1927—1943年间先后三次赴新疆考察，发掘了雅儿湖曲氏高昌墓地、汉烽燧遗址等，在罗布淖尔北岸发现了石器时代遗址、丝绸古道等。围绕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考察，论证了楼兰等古国和古城的地理位置。这些考察对研究新疆历史及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

二是古代思想文化研究。汪奠基的《中国逻辑思想史》，是第一部中国逻辑思想通史。陆懋德的《先秦哲学史》、刘及辰的《先秦诸子的思想方法与思想体系》是对先秦思想的深入研究。马师儒的《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演变。张纯一对先秦墨家的





研究用力甚多，著有《墨子问诂笺》《墨学与景教》《墨学分科》等，《佛教之根本伦理》对佛教伦理学有开拓研究。古史辨代表人物之一罗根泽的《诸子考索》力图清理古史。

三是历史文化研究。陆懋德不仅参与张骞墓发掘，而且对中国历史文化有深入研究，著有《中国上古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史学史》。周传儒著有《中国古代史》《甲骨文字与殷商制度》《书院制度考》。蓝文征著有《中国通史》《隋唐五代史》《魏晋南北朝史》。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对清史研究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四是地方志建设。黎锦熙为陕西地方志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城固县志续修工作方案》中，提出修志不能止于续补前志，要增加篇目及内容，修志材料来源包括实地调查、档案整理、群书采录，极大推动了民国时期中国方志理论的发展。

在这些研究中，师生首先展现了科学精神。李季谷等在考察张骞墓时，不仅请当时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亲自指导，而且注重以大量文物资料说话，通过墓道清理，对灰陶片等文物的研究，最终断定所发掘即为张骞墓。其次表现了批判精神。教授们并不盲目复古，而是批判研究。黎锦熙指出文史研究除要注重固有材料外，还必须“注重科学的方法及时代的认识”^[16]，时代认识要求批判扬弃，选择适应时代趋势的精髓予以发扬。高振业认为在小农社会的长期影响下，百姓存在“安土重迁，缺乏事业欲望与冒险精神”“眼光狭小，重个人利害，国家观念薄弱”等劣根性^[17]。谢似颜指出“我国古代的道德……从没有民族主义的道德相号召者”。佛教“只有人死观，没有人生观，只有超出世间的玄想”^[18]。吴英荃认为传统士大夫的精神品性缺少“热血忠勇”“习于虚伪，耽于苟安”^[19]。科研是教学的动力，这种批判的研究态度，有利于引导学生养成理性的思考能力，促进传统文化教育的深入。

五、举办课外活动加强传统文化教育

联大还注重通过课外活动加强传统文化教育。

一是举办学术讲演，向学生传输传统文化知识。1938年，联大制定了《本校学术讲演办法》。讲演目的一要“增进学生学术”，二要提高学生道德修养。内容包括国防、文学艺术、历史文化及与抗战有关主题。形式分为全校性和院系性两种，全校性讲座由学校常委会主持，各院系讲座由院长或系主任主持。讲座次数及时间安排，由常委会或院长分别决定。讲演人员由学校邀请党政先进、校外学术专家、本校教授担任。每次讲座时间不超过一小时，讲座前公布题目，讲稿由学校送报纸杂志发表。讲演对象以本校学生为主，必要时也允许公众参加。联大第二院甚至每周敦请校内外专家做学术讲演。

1939年，联大组织学生集中军训，以从身心两方面锻炼学生，其中心理方面就是经常邀请“教授名流轮流讲演”，内容主要是“从历史以激扬民族精神”^[20]。如李季谷讲演指出“吾中华民族之势力，卒能续持至今而不衰者，则缘吾族具有特殊的民族精神故也”。然后通过勾践、荆轲、祖逖、文天祥等人物的介绍，鼓励学生以他们为示范^[21]。许寿裳则以勾践的故事鼓励学生做抗战建国的好模范，“只要我们能够学着勾践的精神有自信，有计划，刻苦耐劳，长期抗战，上下一心，共赴国难，那么我们的抗战建国，革命大业，一定是成功的”^[22]。赵兰庭强调“四千余年来的祖宗遗产，要我们来维护；万事不替的民族生命，要我们来延续；我们所负的使命，是何等重大”^[23]，通过传承历史的责任感鼓励学生奋勇抗日。

二是组织实地考察、纪念活动。在经费紧张困难的情况下，组织学生外出调查古迹遗址，了解历史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1938年2月18日，历史系组织考古班学生参观了陕西考古学会所藏文物。在许多考察中，对张骞墓的调查最突出。1938年7月12日，何士骥、周国亭





化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源头活水、民族精神和奋斗动力的不竭源泉，我们应自觉地担负起传承创新中华文化的重任，完成大学应有的使命。

文章来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作者：兰梁斌，博士，现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 [1]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 [M].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8.
- [2] 李云亭. 报告出席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经过 [J]. 西北联大校刊, 1939, (15).
- [3] 本大学校本部本学期第十一次纪念周纪录 [J]. 西北联大校刊, 1939, (13).
- [4] 胡春藻. 精神的改造 [J]. 西北联大校刊, 1939, (16).
- [5] 国民精神总动员 [J]. 西北联大校刊, 1939, (14).
- [6] 历史学系科目表 [G]. 国立西北大学档案, 全宗号:67, 目录号:5, 案卷号:435-1.
- [7]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7] 于正生. 从旅台校友看母校特性 [C]. 台北国立西北大学校友会编. 国立西北大学建校三十周年纪念刊, 1969.
- [8] 黎锦熙. 国立西北大学校史 [C]. 国立西北大学建校三十周年纪念刊, 1969.
- [9] 胡常委春藻在本学期第一次纪念周训词 [J]. 西北联大校刊, 1938, (6).
- [10] 胡春藻. 纪念双十二 [J]. 西北联大校刊, 1938, (7).
- [11] 全校一年级生写作“修养日记”及“读书札记”办法 [J]. 西北联大校刊, 1939, (9).
- [12] 本校校本部本学期第二次纪念周纪录 [J]. 西北联大校刊, 1938, (7).
- [13] 教育系一年级导师与学生谈话会纪录 [J]. 西北联大校刊, 1939, (9).
- [14] 黎锦熙, 钱玄同. 师范大学国文系科目表及说明书 [J]. 西北联大校刊, 1938, (1).
- [15] 李书田. 本校城固本部举行开学典礼报告 [J]. 西北联大校刊, 1938, (1).
- [16] 黎锦熙, 黄国璋. 答复教育部征询各种教育问题之意见 [J]. 西北联大校刊, 1938, (6).
- [17] 高振业. 抗战期间城固县之民众教育 [J]. 西北联大校刊, 1939, (11).
- [18] 谢似颜. 民族主义与道德 [J]. 西北联大校刊, 1939, (13).
- [19] 吴英荃. 士大夫心理之纠正 [J]. 西安临大校刊, 1938, (12).
- [20] 徐诵明. 集训专号发刊词 [J]. 西北联大校刊, 1939, (12).
- [21] 李季谷. 中国历史上所见之民族精神 [J]. 西北联大校刊, 1939, (12).
- [22] 许寿裳. 勾践的精神 [J]. 西北联大校刊, 1939, (12).
- [23] 赵兰庭. 从集训生活说到大学教育军事化 [J]. 西北联大校刊, 1939, (12).
- [24] 张骞墓间古物探寻计划书 [J]. 西北联大校刊, 1938, (1).
- [25] 1938年关于整理张骞墓公函 [G]. 国立西北大学档案, 全宗号:67, 目录号:5, 案卷号:439-1.
- [26] 本校全体师生祭扫博望侯墓并宣誓实行国民抗敌公约 [J]. 西北联大校刊, 1939, (14).
- [27] 本大学派员赴甘青两省考察 [J]. 西安临大校刊, 1938, (11).
- [28] 本校举行林公则徐焚土百年纪念大会纪录 [J]. 西北联大校刊, 1939, (18).
- [29] 姚聪莉. 西北联大的学术自由及其历史价值 [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2). [责任编辑刘炜评]



多议新时代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

——对高陵区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思考

白金刚

中华传统文化灿烂辉煌、源远流长。它经过五千多年文明发展，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对继承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这就指明了我们文化发展的方向，就是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丰富、包罗万象，当下我们虽然从思想上认识到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但是具体到我们的工作、生活实践之中，却往往无从入手，以致于收效甚微。怎样长期地、有效地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怎样把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今社会发展有机结合？和我们每一个人有机结合？

一、传承弘扬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今意义和个体途径

2013年11月下旬，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他在曲阜孔府同有关专家学者代表座谈时表示，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在孔子研究院，习近平看到桌子上摆放着展示孔子研究院系列研究成果的书籍和刊物，他一本一本翻看。看到《孔子家语通解》和《论语诠解》两本书，他拿起来翻阅，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习近平总书记从思想高度、政治高度为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方向。治国必先治人，治人必先自治。前人追求和践行“仁义礼智信”“忠勇孝廉”在当下还具有广深意义，但百年以来，人心不古，已成为中华儒学公认之事实；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展重点在经济上，文化退居次位；西方文化的上岸对传统文化又一次覆盖上黄沙，致使人们向“钱”看，为了各自发展，置“仁义礼智信”“忠勇孝廉”于脑后，出现了一批“暴发户”，对国家短期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对长期民族进步、文化传承大多无益。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重视传统优秀文化成果，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治国、治家战略地位。国家政策来得正当时，治国、治家重在意识形态的统一，如今人心忙于名利，多为浮躁，只有统一意识形态，回归“本心”，治国才能长久。当下的传统文化，可





以说自“破四旧”以来低迷几十年，要重新恢复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需要一个过程，必须有一个切入点，这个点归结到个体的人，只有“孝”易行。

《孝经》开宗明义章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由此可见中华之孝，孝顺父母是孝道的开始。每个人家中都有老人，大力弘扬尊老敬老，使每个人都应当接受和自觉履行的。以此为机，进一步到“立身行道，扬名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在明、清时期的地方志中，我们常看到各地优秀人物之父母先祖，国家按照个人贡献予以褒奖的记录，皆以子贵、以孙贵得封。这就是对家中老人的大孝，在如今仍有现实意义。国人能以此为目标，以建设祖国、服务社会为父母赢得荣誉，哪有时间去想歪邪之事，即达到《史记·太史公自序》说的“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

“立身”是个永恒的话题，是一个人用一生践行得到的最高精神目标。立身行世，除才气外还有德行。一个人的德行，首先看是不是孝子，以德感化周边人，形成正能量磁场，聚集正气，社会也会随之和谐。立身最直接途径就是“孝”。工商农士各个阶层善恶忠奸者，对自己的父母惟以孝悌是从。孝悌在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实践中，最易操作、接受，这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和践行是有益地补充和促进，是国家实施“以德治国”战略的基本途径之一。它将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配套，形成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并使之成为人们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

二、传承弘扬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的立体途径

2017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把传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推上了新的历史高度。着重把传统文化的传承放在学校，以影响学生成才后的德行。《意见》提出：要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按照“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则，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以幼儿、小学、中学教材为重点，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

教育的途径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在当下，传承弘扬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不能一味地把教育摞给学校，应该是和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相辅相成，以达到最佳效果。学校的教育体系完备，不断改进，循序渐进地、有计划地进行，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影响，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也应跟进。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应注重家族教育，以补充学校教育。

上文提到“以孝立身”，也可以说“以孝立族”。中国从原始社会就有了部族，几千年来形成了各宗族的特有文化。目前，在我国南方一些名门望族的祠堂、族谱等保存尚好，宗族文化得到长足发展和延续；北方大部分地区遗存可数，宗族文化逐代减弱，这在当代应该逐步重视起来。陕西蓝田有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乡约《吕氏乡约》，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它的主旨内容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此乡



约形成于北宋熙宁九年（1076），距今近千年，能流传至今，说明有它的生命力。在中华大地，尤其中原地区，古村落遍地皆是，有的村落自秦汉以来谱牒有序，有的唐时成村，绝大多数明清建村。千百年来，他们在宗族族长带领下勤劳奋斗，自强不息，延绵数代，历代出人才者比比皆是。在不同地域，按照本地风俗文化形成了各自独有的“家法”，在当时和“国法”有机统一，对国家的富强，民族的进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天很有必要弘扬宗族文化，树立宗族荣誉感、自豪感，具体到整理宗族历史，弘扬宗族立德、立言、立功优秀人物为学、为宦、为民之精神，由此激励后人向先辈学习，在当今社会重塑自信心，为社会发展，国家富强努力奋斗。

家庭教育最直接有效的就是家族优秀历史教育，它也是社会教育的一部分。良好的家风、族风，从个体的人到独立的家庭，再到集体的家族，对家族式集体是有影响的。由点到面，从孝入手，逐渐渗透生产、礼仪、节气等优秀传统文化在本集体的践行，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是一条捷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倡导，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中华大地，优秀家族村落星罗棋布，这些“繁星”经过家族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又会“星光闪闪”，它们相互影响，相互激励，共同进步，使得整个大地焕发活力，星火燎原，向我们民族追求的“大同”共同迈步前进。

三、传承弘扬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首先要“正人心”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研究阐发、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流等方面，协同推进并取得重要成果，也就是说用八年时间的全面工作，使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显著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更为坚实，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这八年，我们传承弘扬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途径由孝悌入手，家、族共教，其内容涉猎全面，首要应为“正人心”之传统教育。

《孟子·滕文公下》：“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诋行，放淫辞”，“人心不正”则“邪说、诋行、淫辞”盛行。11月1日是西方万圣节，我们身边的年轻人、幼儿园的儿童扮成“鬼”、扮成“妖”，这种潜移默化的文化渗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仅仅是快乐吗？经过调查发现，身边人热衷万圣节多是近几年幼儿教育在推波助澜。幼教师资的个人情感认识、民族自信，应加强认识与学习。培养幼师的中等、高等师范院校应重视民族传统文化自信心教育，从基础教育根源上让中国教育回归“本源”。我们注意到扮成“鬼”、扮成“妖”，直接影响国人的精神趋向。我们中华民族有我们优秀的节日文化，我们的节日文化内涵都是对热爱生命、热情生活，处处充满着对美好明天的向往，也可以说是对美好中国梦的向往。我们今人应从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认真反思，西方文化的“上岸”究竟给国人带来什么？当然，我们也要开放包容，有选择地分享世界文化大餐，比如元旦等，把人民带向积极的生活状态。所以继承弘扬传统优秀文化首要条件就是先“正人心”，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未来中国，是一群正直、正念、正能量人的天下。真正的危机不是金融危机，而是道德和信仰的危机。”人行于世，要行得端，走得正，追其根；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做正派人，为正气官，求正统学，处正道事。正则端正，由心而入，表于其身，达到“身正不怕影子斜”得终极目标。传承弘扬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中吸取“正人心”的营养，把自身感化成福报多、能量大，心怀苍生，大爱无疆的智者、善者。

四、针对地方政府文化部门传承弘扬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的思考

中国五十六个民族都有优秀的、独特的传统文化，汇聚到一起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各民族在一定的区域根据不同的地理条件形成不同的生活、生产习俗，故而形成不同的文化，千百年来的优秀文化民族性、区域性明显。笔者十几年来在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进行文化实地考察整理，和省、市、区政府文化部门、周边区县文化部门、民间文化研究者、爱好者交流甚广，就以点带面，针对西安市高陵区当下承弘扬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提出拙见，仅供各地相关部门、学者参考。

西安市高陵区，为十三朝古都京畿之地，文化底蕴、文化遗存丰富。高陵历来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自有原始先民聚居以来，在本地形成了系统的丰富的生活、生产传统文化，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千百年高陵人一代一代实践不断升华总结，到今天农耕文明转型期，多元文化并行，中国的发展步入新的时代，怎样让优秀传统文化更好的服务和谐社会，造福人民群众？

1.地方志是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依据。这一点，尤其表现在《高陵县志》的历次编纂上。《高陵县志》明代嘉靖间吕柟历时三十年成书，后150年清雍正间邑人樊景颜有修，再后150年光绪间白遇道《高陵县续志》刊印，再到民国2年（1913）乡人有《高陵乡土志》手抄本。到1990年《高陵县志》，又近百年。期间泾野志前有刘志（弘治庚戌年，邑人直隶永平知府刘杰）手稿数页，万历间有续修（万历七年吕幼开修），惜无刻板存世。志书记载了本地区一段时间的社会文化变迁，保留了本地区人类的生活原貌，是今人和先祖们直接沟通的重要载体，还为今人指导前行之路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今逢盛世，高陵迎来新的修志工作，编纂者也迎来新的历史机遇。在区政府领导下，认真仔细、实事求是地做好新志的编写，责任艰巨而光荣。可以说新的《高陵区志》是传承弘扬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依据。

2.高陵区优秀历史人物的挖掘和弘扬。高陵历史上人才辈出，科考中状元三人，解元五人，亚魁六人，进士、举人、贡生、立德、立言、立功者不胜枚举，故被誉为“解状名区”。明代状元关学鸿儒吕柟，重新继承和发扬孔子的仁学思想，亦成为“关中之学”后来发展的主要趋势。他桃李满天下，吴、楚、闽、越士从者众多，大江南北门生合约千余人。一时笃行自好之士，多出先生之门。朝鲜国曾奏请其文为式。此应为高陵优秀历史人物之代表予以宣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这是我们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基本指南。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2016年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关学文库》，其中包括吕柟文集、经集、评传三种；2017年又出版清末关学大家高陵白遇道先生《白遇道集》。高陵古文献的挖掘整理和利用，已经步入传承弘扬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的前列。而后，地方应加大对地方文献内容的挖掘和利用，服务社会造福群众。着力挖掘高陵历史名人为官、治学、领兵事迹，号召各宗族和社会文化爱好者参与其中，整理成册，进校园普及，从娃娃开始教育、了解，增强地方华族青少年的荣誉感、自信心。

3.最大化发挥高陵区文化场馆的教育功能，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2017年11月上旬，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庙底沟文化墓地考古新发现现场会上，公布了考古新发现——首现庙底沟文化大型成人墓地。学者认为该遗址将西安市建城史、建都史，提前到了距今约5500年前。杨官寨遗址是一处带有都邑性质的大型史前聚落遗址，很可能就是中国最早城市的雏形，并为后来国家的起源、中华文明的起源打下了基础。为高陵深厚人文历史添上浓浓一笔。以此为契机进行宣传建设，为本地留下文化场馆，供后来人继续研究学习。

2017年3月30日，高陵博物馆的开馆，是继党史纪念馆、文化馆、图书馆之后，又一对群众、学者开放的文化场所，后续继续做好接待、宣传、教育、普及工作，争取使高陵博物馆、文化馆及高陵场畔等民办博物馆成为高陵区中小学、幼儿园研学旅行之处，每学年进行“认识家乡·热爱家乡”教育，并将此活动常态化。这将成为传承弘扬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重要阵地。

4.高陵区古村华族的整理和宣传。开展社会宗族教育，通过多年高陵地域历史文化调查整理，发现今天的年轻人有一批已经重视各自的家史。这几年高陵区编写家谱、家史已成佳话，需要文化部门专家的引领，有步骤、有计划地搜集整理，形成统一体例，注重历史文物、影像资料的存档，编写《高陵古村华族》，全区普及，让广大群众从前人的只言片语中全面地认识自己，了解家史，寻找自己先祖的历史符号，探究先辈的生存创业之路，这样才能正确地摆正自己的位置，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心中装着光辉的家史和祖先的骄傲贡献力量。把传承弘扬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不当为一句口号，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作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5.高陵区“一带一路”历史文化整合。高陵人文历史，在丝绸之路上留下重要信息。十六国时，前秦苻坚笃信佛教，命吕光迎接西域名僧鸠摩罗什（祖籍印度）东来长安传教。前秦灭亡，后秦主姚萇、姚兴父子崇拜佛教，奉鸠摩罗什为国师。鸠摩罗什传教时，相传曾到高陵县城南八里憩息，据《关中胜迹图志》记载：“西域鸠摩罗什曾休息于此，遂生此树，二月开如杨花，八月结实，状如小栗，壳中皆黄土。”盛唐时期，白鳞原上四坡沟，也叫“骆驼沟”，位于张卜街办贾家村东，自古以来，是通往东渭桥必经之官道，村人称此沟由“骆驼项”“凤凰嘴”“簸箕掌”三部分组成。唐代日本遣唐使曾经过此



西晋时期 著名文学评论家挚虞



挚虞（250—311），字仲洽，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西晋时期著名文学评论家。三国曹魏太仆卿挚模之子。挚虞少年时代，师事人称“西州大儒”的皇甫谧学习。成人之后“才学通博，著述不倦”，在文学、史学、地理研究方面多有建树，成为长安有名的学者。

魏晋之际，政局动荡不安，社会矛盾尖

锐。许多文人如“竹林七贤”等隐居山林，逃避现实，以诗酒自娱。挚虞虽然没有遁世之想，但也看到了“道长世短，祸福舛错”的社会现象，在早期作品中表达了“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消沉颓废倾向。晋武帝泰始年间（265—274），挚虞被地方长官举荐为贤良，出任中郎。在他上给武帝的对策中，认

地，日本平安时代著名僧人靖益僧圆仁，随第十八次遣唐使就是从此下原过东渭桥进入长安城的。圆仁在他所著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对途径东渭桥有详细的记载。这些史存资料，见证了当年丝绸之路高陵县的繁荣。当下国家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怎样把优秀历史文化和当今高陵“一带一路”建设结合，更好地宣传高陵，为高陵招商引资提供软实力，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多下功夫，做文章，提高高陵的知名度。

6. 政府各部门共同协作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还应该注意政府与政府、部门与部门，政府与民间的有机协调统一。经过多年的调查整理经验，发现区委党史办公室、政府、文化局下属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档案局、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以及本地政府同周边政府相关部门，政府和本地民间文化爱好者之间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在地方传承弘扬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的梳理和补遗勘误工作上，可以更加准确、更加及时。同时各方互通有无，常态沟通，防止资源独享，同类文化重复整理、表述混乱、以讹传讹现象，地方政府应加强文化部门沟通学习，这样挖掘整理的优秀传统文化会不被方家质疑，不会扰乱视听，更杜绝对后世的误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新时代下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并从国家战略资源的高度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性力量。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内容，高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把本民族的故事讲好，把本民族的文化更好地结合新时代、新机遇传承下去，弘扬开来。

（作者：西安市新城区昆仑小学教师，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第4次会员代表大会代表）

为国家的要务首先是确立法度，其次要善于用人，才能保证政治清明，社会稳定。晋武帝很赏识他的才华见识，曾先后任命他为太子舍人、闻喜县令、尚书郎等职。

两晋时期是门阀士族把持地方选举、掌控朝廷大权的时代，士人的姓氏、籍贯和门第阀阅成为能否被推举为官的主要标准，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政治格局。

当时挚虞也随波逐流，撰写《族姓昭穆》十卷，详细考证天下姓氏的渊源、籍贯、族望与郡望。

晋惠帝司马衷登基以后，挚虞先后担任过左秘书监、卫尉等职。“八王之乱”爆发后随惠帝前来长安，在东海王司马越进攻关中、将惠帝又接回洛阳的混战中，文武百官逃散，挚虞先流落于鄂、杜，后逃入终南山，以采摘橡子等果实维持生命，后来又辗转赶到洛阳，出任光禄卿，转太常卿。永嘉五年（311），匈奴人刘渊建立的汉国攻陷了西晋首都洛阳，纵兵大掠，“洛京荒乱，盗窃纵横，人饥相食”。挚虞为官清廉，生活清贫，最后饿死在洛阳城中。

挚虞治学广博，著述甚丰。在典章制度方面，著有《新礼仪》五篇，《决疑要注》一卷；在地方史志、民俗风情方面，著有《三辅决七卷录》，《畿服经》一百七十卷；在文学和文学评论方面，著有《文章志》四卷，《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别志论》二卷。惜其著作大部分散佚失传，仅有残文断编

存录于后世一些类书中。明末文学家张溥在选编《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时，辑其佚文编成《挚太常集》流传至今。

挚虞著作中对当时和后世影响最大的是《文章流别集》和《文章流别志论》，分类选编了古代文体文章，是一部具有相当规模的文章总集。《文章流别志论》是一部探讨各类文章的性质和源流，评论作家及其作品得失的专门论著，也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文艺评论的先驱性著作。这部书现仅残存十多条，但可从中看出挚虞的政治倾向和文学好尚。他从儒家的正统观念出发，把文章的作用归结于“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序，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他评论诗歌以《诗经》为总体标准，对汉代以来的乐府民歌持贬低态度，并指出汉赋有四大过失：“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他的这些评论，实际上是有感而发，从表面上看是指出了汉赋华丽不实、以辞害意的弊病，实际上是对西晋一代文风虚浮，崇尚靡丽的批判。由于该书内容广博，分析详尽，精于事理，因之后世文学评论家对其评价很高，南朝钟嵘称挚虞为“知音”。在挚虞的影响下，南北朝出现了一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面的专著，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这两部在文学批评史上影响深远的著作，就是对《文章流别志论》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颇为赞赏的南北朝时期 梁朝名将韦叡



毛泽东在世时涉览群书，酷爱文史典籍，并善于以古喻今，总结历史经验，服务现实社会。一部《二十四史》长达三千余卷，洋洋四千万余言，无论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政务繁忙的和平年代，毛泽东都随身携带，一有闲暇就抓紧时间阅读，不仅通读了一遍，一些重要的篇章甚至反复研读三四遍，并留下大量的眉批评语。其中《南史·韦叡传》通篇不过三千余字，却是毛泽东最感兴趣、留下批注最多的一篇历史人物传记，通篇浓圈密点，层层批注，仅文字批注就多达25处，盛赞韦叡是有“刘秀、周瑜之风”的一代名将，并号召“我党干部应学韦叡作风”。

韦叡（442—520）字怀文，京兆杜陵（今西安市长安区东南）人，是南北朝时期南朝萧梁的著名将领。他在年近花甲时率众投奔梁武帝萧衍，从此驰骋疆场，以胆识过人、足智多谋、攻守有方、屡建奇功而闻名大江南北，当时人称“韦虎”，赞颂他行军作战犹如猛虎一般英勇顽强，威震敌胆。

一、“躬自调查研究”的求实之风

在南朝齐、梁政权交替的时候，北方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趁机举兵南下，占领了淮南大片地区。天监四年（505），韦叡奉命督率众军，西进发动了收复军事重镇合肥（即今安徽省合肥市）的战争。他首先命令前军先锋进攻敌军重兵把守的合肥前哨阵地小岷城（在今安徽含山之北），结果数日不下。韦叡闻报，只带领少数亲兵飞马赶到前线，同先锋一起绕着守军围栅观察地形，分析敌情，商议破

城良策。在详细调查的基础上分析研究了敌我态势后，韦叡已成竹在胸，指挥军队发起猛烈进攻，不到半天就拿下了小岷城，接着挥师西进，直取合肥。

合肥地势险要，城池坚固，易守难攻，北魏军队又在东西两面分筑两座小城，派有重兵把守，与合肥形成犄角之势。韦叡亲临前线观察之后，决定首先攻克东西二城，使合肥守军陷于孤立。正当攻守双方激烈厮杀之际，北魏的5万援军赶来欲前后夹攻梁军。南梁众将见北魏援军人多势众，唯恐被包了饺子，请求韦叡上奏朝廷增兵助战。韦叡不肯，说：“贼已至城下，方复求军，且吾求济师，彼亦征众。‘师克在和’，古人之义也。”在他的激励之下，南梁将士人人奋勇，个个死战，一举击溃北魏援军，并挟着战胜余威，迅速攻克东西二城，只剩下合肥一座孤城，昼夜攻打，但久久不能攻下。韦叡见强攻难以奏效，便下令停止进攻，自己带着幕僚与众将再次走到前沿阵地，绕着合肥城走了大半个圈儿，考察地形研究新的作战方案。当看到合肥城外滔滔东流的淝水之后，他捋髯一笑，顾谓左右道：“你们知道春秋时期引汾水以灌平阳、绛水以灌安邑的威胁性话语吗？要破合肥，即在淝水。”回到帅帐，即令在城的西北方淝水上游构筑堤坝，抬高水位，并疏通渠道，直抵合肥城下。到了决堤放水之日，随着韦叡手中令旗一挥，滚滚河水奔腾而下，合肥城外顿时波涛汹涌，城墙在巨浪持续不断的冲击下轰然倒塌了几十丈，梁兵乘战舰舢板攻入城内，斩杀魏军守城



主帅，俘虏魏军1万多人，杀死不计其数，占领了合肥全城。韦叡入城后，先引流退水，安抚百姓，稳定秩序，然后修复城墙，亲自镇守。

合肥之战是南北朝历史上著名的攻坚战役之一，通过这场战争，南梁收复了淝水以东、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扭转了开国以来军事上处于劣势的局面。而韦叡经此一战，名扬天下，威震北方。从此北魏军队中长久流传着一首歌谣：“不畏萧娘与吕姥，但畏合肥有韦虎。”“萧娘”指南梁此次北伐的总统帅萧宏，“吕姥”指南梁另一路主将吕僧珍，两人都因怯敌畏缩不前，受到了魏军戏赠以妇人衣裳的侮辱嘲笑。而韦叡绰号“韦虎”也出自这一首歌谣。在合肥之战前后韦叡每次战斗之前都亲临前线考察山川地形、敌我态势，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作风，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生大力提倡调查研究并身体力行的毛泽东读到这一段文字时，在“叡巡行围栅”“叡案行山川”两处都加了旁圈，并且两次重复批语“躬自调查研究”，以表示对韦叡这一作风的赞赏，并列为“我党干部要学韦叡作风”的内容之一。

二、“敢以数万敌百万”的勇敢之风

韦叡指挥作战，不仅亲自调查研究，力求做到知己知彼，而且胆识过人，激励部下英勇顽强，敢于以少击众，以弱胜强。在攻打小岷城前韦叡带幕僚和亲兵察看地形时，突见对方城门大开，冲出数百人马，列成阵势，意在挑战。随身将士因己方兵少力薄，且轻装前来未穿甲胄，急劝韦叡后撤以防不测，韦叡却决定上前迎击敌军，他说“此小城中有敌兵2000余人，如果闭城坚守，则很难攻克。现在冲出的这几百人马必是守敌军中骁勇，

急于邀功请赏，如能挫败他们，可使敌兵丧胆，城可不攻自破。”随身将士都将信将

疑，面有难色，韦叡一指身后侍从手中象征军帅权力的符节，厉声喝道：“朝廷授此，不是为了装饰军容，点缀威风，韦叡之令，不可违抗，进击！”将士不敢怠慢，鼓起勇气一齐冲杀过去。魏兵猝不及防，顿时被冲击得七零八落，溃败回城。在刚攻打合肥时，守城魏军主帅见韦叡以水为兵，准备倒灌合肥，自然深为恐惧，派骁勇数千前来毁堤。这股魏军攻势凶猛，突破南梁前营寨栅，一直冲杀到堤下韦叡帅帐前面。部将见情势危急，都劝韦叡暂时退却，以避其锋。韦叡大怒，喝退众将，下令立帅旗于自己身前，示无退志。南梁众将羞愧之际勇气倍增，个个身先士卒冲向敌军，奋勇格斗，普通士兵也大呼上前，杀声震天，顷刻之间就全部歼灭了这股魏军。

天监五年（506）秋，北魏耻于合肥之败，派中山王元英率兵数十万，号称百万，大举伐梁。南梁淮水线守军主帅、梁武帝六弟萧宏未战先逃，致使全军溃败。元英挥军渡过淮水，包围北徐州刺史昌义之部于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昼夜攻打。昌义之一日数次飞书告急，梁武帝赶忙调集兵马前往增援。韦叡受命从合肥出发，星夜兼程赶往前线，与先期到达的另一路援军曹景宗部会合于淮水之滨的邵阳洲（今安徽凤阳东北）。邵阳洲是元英号称百万之众的大本营，连营四十座，旌旗如林，声势浩大。韦叡抵达后，一改曹景宗筑垒固守、不敢轻进的方针，采取出奇制胜的策略，夜里指挥士兵在营前20里的地方挖掘长堑，遍栽鹿砦，以隔断北魏军队大本营与围困钟离部队之间的联系。天亮以后，元英见一座新城耸立眼前，大吃一惊，以杖击地道：“难道梁军有神兵相助吗？”派勇冠三军的大将杨大眼率1万多骑兵前来攻城。韦叡在城前结车为阵，暗伏2000弓弩手于阵中。杨大眼骑兵一拥而上，弓弩手万箭齐发，上射人身，下穿甲马，





魏兵死伤惨重，杨大眼也被射中右臂，弃枪拍马，落荒而逃。元英不胜愤怒，第二天亲自出马攻城。平常身体瘦弱不能骑马的韦叡也端坐木轮车，手持竹如意，指挥军队迎战。双方只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激战了一整天不分胜负。元英见以众击寡竟难以取胜，怒火冲天，夜间再次发起攻击，韦叡扶杖亲临城头，冒着如飞蝗一般的乱箭督军反击，元英不禁为之气馁，只好鸣金收兵。

起初，魏军在围困钟离时，于淮河上架起两座浮桥，南通邵阳洲，作为南北通道接济围城部队，输送粮草给养。桥上两边围以木栅，派驻士兵日夜巡守。为了全歼邵阳洲上的魏军，韦叡经过认真观察和仔细研究之后，决定运用火攻，斩断这一通道。天监六年（507）三月，正是春汛时期，淮水暴涨，几与桥平。韦叡招募军中精通水性的壮勇组成敢死队，乘大型斗舰绕到敌后，然后分驾小舟，装满用鱼油浸泡过的茅草，飞驰两座浮桥下，纵火焚桥，恰在这时大风骤起，风借火势，火助风威，一时水面一片通红，烟焰弥天。敢死队早已弃船登桥，拔栅斫木，瞬间栅毁桥坠，顺水流漂。南梁后续水军乘高船斗舰，冒烟突火，封锁了水面。韦叡从正面指挥军队发起攻击，梁兵莫不以一当十，大呼竞进。在梁军的水陆夹击和凌厉攻势面前，洲上魏军土崩瓦解，纷纷弃甲逃命，慌乱之中被杀死的有十几万，被淹死的也有十几万，叩首投降者不计其数。元英、杨大眼见大事不好，率领残兵败将拼命突围而走，围城部队失去后盾，也纷纷撤围退兵。坚守钟离城达100多天的昌义之悲喜交加，连声叫道：“真是又活了一世啊！又活了一世！”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在守城期间备受煎熬的钟离全城军民更是欣喜若狂，夹道欢迎韦叡入城。

邵阳洲一役是南梁在继合肥之战后又一

次取得重大胜利战争，也是自南北朝对峙以来南朝对北朝战争中取得的第一次大捷。这一战在韦叡的指挥下，南梁以区区数万兵力大破北魏号称百万的大军，只杀得北魏军队沿淮河百余里尸骸枕藉，举朝为之气馁。韦叡也因功封侯，任右卫将军。他在这次战役中所表现出来的杰出指挥才能和敢于以少击多、以弱克强的非凡胆识勇气，也受到了后世的高度赞赏。毛泽东在读韦叡传批注中写道“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学习他这种勇敢顽强的作风。也正因为此役，2007年4月《华夏历史网》在评价杰出历史人物时，将韦叡与孙臧、李牧、卫青、霍去病、周瑜、郭子仪、徐达等相提并论，列为中国古代10大天才名将。

但胆大如虎的韦叡在行军作战时，也有露怯示弱的一面。天监七年（508），韦叡奉命统领各军支援安陆（今湖北安陆县），以防魏军南袭。他下令深挖护城河，加高加厚城墙，并修筑高楼昼夜了望敌情。众将都诧异他这次为何表现如此胆怯示弱，韦叡说：“不然，为将当有怯时。”毛泽东在批注中对他的这一做法和说法极为欣赏，并援引历史战例加以肯定：“此曹操语。夏侯渊不听曹公此语，故致军败身歼。”魏军听说韦叡筑城以待，壁垒森严，立即退兵，韦叡不战而胜，众将才心服口服，对韦叡更加钦佩。

三、构建内部和谐关系的君子之风

作为南北朝时期威震四方的一代名将，韦叡每逢作战身先士卒，动如猛虎，但生性却比较恬淡，不喜戎装，平时着儒服冠巾，温文尔雅，常常白天接待宾客，夜晚通宵达旦研读兵书，三更即起床掌灯处理军务，凡露营治垒，修寨立栅，都亲自检查监督，从来不敢懈怠。他居官以惠民为要，治军以爱兵为本，善待士卒，抚慰兵士，无微不至，“士卒营幕未立，



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所以当时远近有识之士纷纷前来投奔，韦叡都亲自接见，予以热情接待。毛泽东圈读到这一段，对韦叡治军十分欣赏，逐字旁圈，并作了“劳谦君子”的四字批语。

韦叡为帅，十分注意内部的和谐与团结，强调全军上下同心同德。在合肥战役前，大将胡景略与前军主将赵祖悦之间发生矛盾，互相忌恨不已，一次两人竟然公开争吵，胡景略气得脸色发青，咬齿出血，赵祖悦也怒目而视，势不两立。韦叡深知大敌当前，将帅不和，必会起祸端，于是便把胡景略请来，摆下宴席，亲自把盏，劝说胡景略以大局为重，切勿恚气私斗，并专门派人同样劝说赵祖悦。

胡、赵二人在韦叡的劝说下深自惭愧，最终消除了怨气隔阂，在以后的作战中相互协助，共同取得了战役的胜利。另一大将曹景宗为人争强好胜，自己为一赳赳武夫，平常却喜欢附庸风雅，但在看书写字时自己看不懂不会写的地方，从不屑于询问别人，自己便望文生义，或者自创读音，或者自造新字，在满朝文武面前从来都是居功自傲，丝毫不知恭谨谦让。唯独对韦叡特别敬重，待以师友之礼。韦叡对曹景宗也以礼相待，用其所长，避其锋芒。钟离之战结束后，守城主将昌义之十分感激韦叡挥军兼程救命之恩，在宴请韦叡和曹景宗两路元帅时，设二十万钱作为赌注，让二人喝卢呼雉，进行赌博以决胜负，胜者即为二十万钱的主人，实际上是想以此做法酬报二人之恩。只见曹景宗一挽袍袖，先掷得雉，韦叡微微一笑，后掷得卢，本来以卢赢雉，韦叡趁二人不备，赶紧一展袍袖，盖住赌局，拨反一子竟作塞，故意输给曹景宗，然后抚掌大笑说：“真是奇事！”昌义之识破韦叡机关，但不明说，心中感叹韦叡的宽容大度。战后，曹景宗与其他将领争先派人向朝廷告捷献功，只

有主帅韦叡镇静自若，告捷文书最后送达。毛泽东对韦叡这些做法特别赞赏，批下“劳谦君子”“干部需和”八字评语，并认为“曾景宗不如韦睿远矣！”盛赞他为人谦逊、豁达大度、团结部下的作风，将这一作风列为“我党干部应学韦叡作风”的重点之一。

四、不居功不贪财的仁者之风

魏晋南北朝是世家大族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特别是自东晋以来的南朝统治者及官_僚贵族大多自矜门第高贵，崇尚清谈，夸豪斗富，奢侈成风，又竞相崇佛佞佛，像梁武帝萧衍本人就曾极为荒唐，竟然三次舍身同泰寺作“寺奴”，然后又每次由群臣凑集一万万或两万万钱的巨款将他赎回来做皇帝，为同泰寺敛集了数额惊人的财产，成为南朝最富有的寺院。对于这些恶风陋习，同样出身于名门望族的韦叡深恶痛绝，自己绝不随波逐流，但又不可能以己之力扭转世风，所以只能做到洁身自好，从不趋炎附势。安陆保卫战结束后，韦叡功成思退，屡屡上表辞职，要求告老还乡，梁武帝都不允许。他便经常称病闲居家中，以经史教授子弟，很少过问朝廷政事。梁武帝普通元年（520），韦叡又被提升为侍中（宰相），迁车骑将军。未上任而病卒于家，享年79岁。韦叡虽然一生作战叱咤风云，做官封侯拜相，但从不居功自矜，生活也很俭朴，每次作战胜利之后缴获物资堆积如山，他丝毫不取；所得赏赐尽数散给部下将士，所得俸禄也大部分送给亲戚故旧，因之死后家无余财，薄葬入土，与当时梁武帝统治下的南梁王朝贪财无厌、奢侈成风的习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毛泽东也为此写下了“不贪财”“仁者必有勇”的两句批注，高度评价了韦叡洁身自好、艰苦朴素的品质，号召共产党人都要学习韦叡这一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



全真教的创始人—— 王喆（王重阳）

北宋末年，内忧外患，国运衰颓，昏庸的徽宗皇帝崇信道教，因此道家思想大肆盛行。宋室南渡后，北方宋朝遗民中逐渐兴起一种新的道教派别——全真教，并逐渐广泛传播。在金元之际的数十年苦难岁月中，中国大地铁骑纵横，战火纷飞，生灵涂炭，但也是全真教的鼎盛时期。

全真教的创始人是王重阳。王重阳（1112—1170），金代道士，原名中孚，字允卿，后更名世雄，字德威，入道后，改名喆，字知明，号重阳子，金京兆府人。其家本是咸阳大魏村一个富裕人家。据说其母怀他24月，才将其生下。美须髯，大眼睛，身高六尺多，而且自小不群，幼好读书，气豪言辩，深得长辈喜爱。弱冠修进士业，系京兆学籍，善于作文，才思敏捷，但是却科考未中。他颇喜弓马，武艺超群，于是又去参加武官考试，最后考中金朝的武举甲科。当时女真王朝对汉民族歧视，所以武举考中的王重阳仅被任命为一个在当地负责酒税的小官吏。而胸怀大志的他难以甘居寂寞，于是便辞官回家。

48岁时王重阳生活出现了重大转折，他在甘河镇一家酒铺中遇到一位隐士，隐士“密付口诀，又饮以神水”，并传授给他许多仙道修炼的秘术。全真道称这次奇遇为“甘河遇仙”，并说授经的隐士就是吕洞宾、汉钟离的化身。第二年，王重阳又在礼泉与他们相遇，再次领受修道真谛。

受教之后的王重阳行为举止开始变得异于常人，金世宗大定元年（1161），他将家



产分给了亲友乡邻，妻子和孩子托付岳父照顾，自己一人来到终南山的户县南时村修行隐居，自号重阳子，走上了弃家修道之路。他给自己取名“王害风”，于南时村挖了一个深4米的洞穴，称作“活死人墓”，且置“王害风灵位”的碑石于墓上。整日于洞中定坐深思，潜心修持。金大定三年（1163），王重阳走出修行地洞，功成丹圆，填平墓室，迁居刘蒋村，修筑几间简陋的茅庵居住修持。大定六年（1166），他于长安（今西安）深村吕道人庵壁曾题诗一首以示其志，诗云：“地肺重阳子，呼为王害风。来时长日月，去后任西东。作伴云和水。为邻虚与空。一灵真性在，不与众人同。”

大定七年（1167），王重阳毁掉所住茅庵，前往其师所示东方——山东地区传道授徒。王重阳传道善于随机施教，尤长于以诗词歌曲劝诱士人。大定九年（1169），王重阳应周伯通之邀，住进金莲堂。每到夜晚，人们都能看到金莲堂神光外射，堂上堂下如同白昼。最初，人们都以为起了大火，匆匆忙忙拿来水具灭火，结果却发现王重阳端坐在光明之中，神态怡然。

王重阳先后收得马钰、孙不二、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郝大通、王处一等七人为弟子，恰应七朵金莲之兆，后世把他们称为“全真七子”。大定九年（1169），他携弟子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四人西归陕西传道，结果卒于开封途中。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他被封为“重阳全真开化真君”，武

西安仰韶文化聚落遗址——杨官寨遗址

杨官寨遗址位于高陵区姬家乡杨官寨村泾河左岸的一级阶地上，海拔约498米，遗址南距泾河约1公里，面积80余万平方米。泾渭两大河流在遗址东约4公里处汇合形成泾渭三角洲。2004年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其进行了长达4年多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逾17278平方米，发现各类房址49座、灰坑896个、壕沟9条、陶窑26个、瓮棺葬32个、墓葬45座、水井5口，出土各类可复原的器物7000余件。

这个遗址的文化堆积主要属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文化遗存和半坡四期文化遗存，具体从时代来说稍晚于前述的半坡、鱼化寨及姜寨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有两项：一是在发掘区南端发现了成排分布的半坡四期文化的房址

和陶窑，房址基本上是平面呈“吕”字形的前后室结构，前室一般是地面式，后室则为窑洞式，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窑洞式建筑群；二是发现了仰韶文化庙底沟文化类型时期的聚落环壕，所谓环壕聚落，就是原始社会大型人类聚居地。

庙底沟遗址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县城东南，地处黄河支流青龙涧南岸，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为考古学上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命名地，其时代稍晚于仰韶文化的半坡、姜寨等类型。

杨官寨遗址发掘区南端成排分布的半坡四期文化的房址和陶窑共有房址17座，基本是平面呈“吕”字形的前后室结构，在房址和窑址

宗至大三年（1310）加封为“重阳全真开化辅极帝君”，全真派将他尊为北五祖之一。

全真道创立之前，道士是不出家修行的，过着与世人相同的生活。王重阳从佛教中借鉴了许多东西，使得全真道与以往的道派产生了明显的区别。全真道要求道士出家住宫观，不娶妻室，不食荤腥，主张清修炼养，并在宫观中制定了许多清规戒律，以约束道士的生活，集中精力修养。他主张儒、释、道三教平等，三教合一，提出“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的融合学说。全真道以《道德经》《孝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为必修经典，认为修道即修心，除情去欲，心地清静便是修行的真捷径，身在凡尘而心已在圣境，即“人心常许依清静，便是修行

真捷径”。所以，全真道不崇尚符篆，不事黄白炼丹之术，也不信白日飞升之说。王重阳传世著作甚多，有《重阳全真集》《重阳立教十五论》《重阳教化集》《分梨十化集》《重阳金关玉锁诀》《重阳授丹阳二十四诀》等，均收入《正统道藏》。

经过王重阳及其弟子们对全真道教义、教规及理论等全面阐释，全真教以新的面貌屹立于道教诸派中。王重阳死后，全真教理论日益被社会各阶层接受，传教范围遍布北方关中、河南、河北、山东等广大地区，自从元代以来，全真派与正一派一直延续至今，发展成我国古代社会后期道教最大的派别之一。



附近的一个灰坑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仅尖底瓶可复原的就达18件，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的陶胚残片和一件可能是用来制作陶器的工具——轮盘，说明这些由成排的房子、陶窑及储藏陶器的窖穴等遗迹构成的区域可能是当时的陶器作坊区。

庙底沟文化时期的聚落环壕经初步钻探，环壕平面形状大致呈梯形，基本为南北向布局，周长约1945米，壕内面积24.5万平方米，壕宽约6米—9米、最宽处约13米，深2米—3米，如此巨大的庙底沟时期环壕聚落遗址在全国实属罕见。环壕西部发现门址一处，宽2.7米左右，在门道两侧的壕沟堆积内出土了大量陶、骨及石质文物。考古工作者通过发掘摸清了该遗址不同时期聚落的布局，遗址南部多为半坡四期文化居民聚居区，北部则是庙底沟文化的聚居区。就该聚落本身而言，推测这一遗址有可能就是关中地区庙底沟文化的中心聚落。杨官寨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可以说填补了仰韶文化在关中地区的一个重要空缺。如果说前述的姜寨遗址只是一个母系氏族社会的小村落，那么相当于12个姜寨的杨官寨遗址就足以

成为一个城的规模，它是我们目前所知同时期内唯一的一座面积最大、环壕保存较好的中心聚落遗址，或许就是中国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城邑。

那么，这个聚落是什么样的社会性质，其中的成员是怎样的组织形式，如何分工，目前还都是一个谜，这些谜团只有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才会被逐渐揭开。

2015年冬，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该遗址东部区域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时，再次取得重要收获，揭示出一片基本保存完整的庙底沟文化时期的大型成人墓地，这也是国内首次发现并确认的庙底沟文化大型墓地。

据考古队领队杨利平介绍，墓地位于遗址环壕聚落东部，总面积近9万平方米，目前实际发掘面积约3800平方米，已发现庙底沟时期墓葬300余座，墓地内墓葬分布十分密集，初步保守估计，墓葬总数超2000座，规模空前。

众所周知，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扮演的作用不言而喻，其中最早在西安建都的朝代可以追溯到距今3000年前的西周。

然而，通过近年来考古人员在杨官寨遗址开展的考古发掘工作，已经基本理清了该遗址的整体布局结构，在该遗址范围内发现建造有大型环壕的庙底沟文化聚落、两侧成层摆放大量陶器的西门址、环壕内部疑似堆土迹象、聚落中央的人工水利设施等，加上本次发现的东区大型普通居民公共墓地，无疑勾勒出了一个早期城市的雏形。下一步，考古队还要探寻西门址外可能对应的高等级贵族墓地、东区墓地可能对应的东门遗迹和聚落内部中央大道，如果这些推论都能得到证实，那么杨官寨遗址作为



杨官寨遗址庙底沟文化墓地发掘区航拍图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辋峪峪口位于蓝田县蓝关镇榆林村东，环山旅游公路与沪陕高速公路交叉口以西。王维有诗“秉兴登山瞰辋川，水田更木尚依然；欲知漠漠淙深处，还在清和四月天。”在诗人王维眼里，有一条川却像一张网，弯曲反复，辐射多向。这道川即辋川，也叫辋峪。

辋川河，一名辋川、辋峪河、渥水。《水经注》：“渥水西绕蜭关，北历蜭柳城，又西流入灞。”《雍大记》：“渥水即辋谷水，商岭水流至辋谷如车网环凑。”《长安志》：“辋谷水出南山辋谷，北流人满水。”辋川河是灞河第二大支流（第一大支流沣

庙底沟时期关中地区规模最大、规格最高聚落的都邑性质必将展现无疑。如此一来，西安的建城史、建都史或可提前至约5500年前的庙底沟时期。

2017年11月，相关媒体记者就此采访了陕西考古研究院和其他相关专家，发表了一系列报道。省考古研究院杨官寨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杨利平：“我们根据当时的随葬品还有我们侧年的一些数据，发现这个墓地应该是庙底沟时期，大概距今有5600年前后。这也是首次确认的这一个时期的墓地。”

经初步鉴定，墓地居民在人种上与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关系较近，墓地人群的死亡年龄主要集中在青、壮年时期，这和当时青壮年男性主要承担的外出狩猎危险工作及部落间冲突造成集中死亡有关。尽管墓地内的墓葬分布十

分密集，但在持续200多年的使用过程中，没有发现一例墓葬之间存在着打破关系，证明当时人们在营建墓葬的过程中经过了整体规划，并可能有专人负责管理。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这个墓地的材料，在仰韶文化这个时期也是非常罕见的一批材料，过去也不知道仰韶文化中期，也就是仰韶文化庙底沟这个阶段有这样的大型墓地，所以这样一系列新的发现，给我们仰韶文化的研究，乃至整个关中地区这个阶段的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这次发现的大型墓地是国内首次发现并确认的，仰韶时期庙底沟文化类型的大型墓地，填补了我国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为这一文化类型的葬俗、人群血缘关系、聚落形态、社会组织状况等研究提供了实物依据。





河)，流域呈葫芦形，大部分属秦岭北麓山区。辋川长57公里，流域面积534平方公里。辋川河有东西二源。东源名曰东采峪水，长21公里，源于葛牌乡南的东沟南部，俗称沙沟，是辋水之正源。北流汇油房沟、西沟二水、小山门沟水、瓦屋沟水至葛牌镇，再汇梨园沟水、南沟水、粉房沟水，西北流至铁索桥汇弥陀河水，银锭沟水、勇山沟水、尧沟水、榨菜沟水、纸房沟水、麻子沟水、虎岔沟水、凉水沟水、黄沙沟水、孤独沟水至两河桥，与辋水西源相汇。西源又名西采峪水，全长20公里，它源于红门寺东南的刘申沟东部，西北流汇大北沟水、大南沟水、张路沟水、北沟水、费家沟水、姚沟水、王和尚沟水、赵家沟水、刘家沟水、板厂水、唐家沟水、松林沟水、大坪水、武家沟水、杜家沟水、潘家园水至红门寺街，汇源于秦岭南麓的西采峪沟水北流，再汇四女桥沟水、冰水沟水、核桃沟水、土家沟水、印沟水至两河桥，与东源相汇。下称辋河。辋川河西北流，汇地瓮沟水、石板沟水、诸家河水、突沟水、西杆沟水、大苜蓿沟水、陈家沟水、小苜蓿沟水、鸦获崖沟水、郭岭沟水、黄沟水、陶峪河水、玉村沟水、营上水至县城西南汇入灞河。

辋川的人文地理，就是王维的辋川图与辋川诗！王维从中年以后在蓝田隐居达20年之久。他在辋川别业亲自经营了辋川20景，为每一景点定名，咏诗以赞之，而且邀集诗友在玉山蓝水间“敲诗炼赋”，寻趣陶情。

辋川溶洞位于蓝田县县城南20公里的辋川乡，风景区地处风光秀美的秦岭北麓，辋川溪水河畔，距西安市60公里，西蓝高速公路连接蓝葛公路可直达景区。这里群山环抱，峰峦叠翠，四季鸟语花香。王维当年营造的“辋川别墅二十景”，在我国园林史上独树一帜，以山水田园诗傲立初唐文坛，名传千古，享誉海外。目前，景区面积8平方公里，分为天然溶洞游览区、高空滑索娱乐区、通真道教建筑区、七星潭自然游乐区等，已建成开



辋川溶洞

放的凌云、锡水两洞，是一座天然地下水水晶宫，具有北方溶洞特色。凌云洞在照壁峰腰，海拔千米，高耸凌云得名。1931年被通真观道士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建成开放时，游人如织。洞深527米，分上下两层，10个洞厅，百余景观。洞内钟乳石笋千姿百态，彩灯辉映，栩栩如生，“晚霞驼铃”“琉璃宝塔”“仙女沐浴”等让人叹为观止。锡水洞相传是一位老道用锡杖所捅而成，在成仙岭半山腰与凌云洞隔溪相望。相传王维曾在此“敲诗炼赋”，修悟禅观。



木塔寺遗址公园

隋唐长安著名佛寺——庄严寺（木塔寺）

庄严寺位于隋大兴城西南隅永阳坊东半部，与该坊西半部的大总持寺左右比邻，在今雁塔区丈八沟街道木塔寨村北。隋初置宇文弼别馆于此坊。隋仁寿三年（603），文帝为献皇后立禅定寺。建筑大师宇文恺营建都城时，以京城之西有昆明池，地势低下，奏请于寺中建木塔以补之，高330尺，周回120步，大业七年（611）竣工。唐一尺等于今0.294米，一步等于今1.47米，塔高应约97米，周回约176米。由此可见，当时的木塔比大雁塔高32.5米，比现存的小雁塔高53.6米。不难想象，高耸屹立的木塔，必然成为隋唐长安城西南隅的标志性建筑，成为人们登高远眺的游乐胜地。唐武德元年（618）改为庄严寺，因寺内有木塔，俗称木塔寺。唐会昌元年至六年（841~846）禁佛时为长安城内幸存四大寺院之一（其他三寺为大慈恩寺、荐福寺、西明寺）。

隋时的禅定寺和唐时的庄严寺在隋唐时代香火旺盛，《长安志》载：“天下伽兰之盛，莫与此寺为比。”寺址占地3.33万平方米，有佛殿、厢房、僧舍等建筑。隋时寺内有佛牙，长三寸，系沙门法献从乌踵国所获，由豫章王杨暕自扬州持入京，文帝令置此寺。唐贞元十

年（794），新修宝塔，供佛牙于其中，寺内香火极盛。寺中有卢楞伽、尹琳画。玄奘法师曾在此寺小住。据《宋高僧传·卷一六》载，大中七年（853）宣宗幸庄严寺“礼佛牙，登大塔，宣问耆年”并改寺名为“圣寿寺”时，庄严寺仍保留着昔日的盛况。唐代诗人宋之问有《奉和圣制闰九月九日登庄严、总持二寺阁》诗：

闰月再重阳，仙輿历宝坊。
帝歌云稍白，御酒菊犹黄。
风铎喧行漏，天花拂舞行。
豫游多景福，梵宇日生光。

唐末战乱兵火，庄严寺也未能幸免。但由于其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宋元时得以重建，而稍具规模。

庄严寺在元末兵火中又遭浩劫，明代重建恢复，但在明末战乱中，再次废毁殆尽。清初康熙年间又多次修建殿宇，重塑佛像，使庄严寺又稍具规模，但已同唐时规模





周至牛斗虎

周至民间舞蹈牛斗虎起源于周至县楼观镇八家庄。早年庄东十字井庙内的木匾上记载着“乾隆年间八家庄耍牛斗虎”的字样。它来源于一个惊心动魄的民间故事，传说画匠杜困进山打柴，偶遇青牛救主、勇斗猛虎、以正胜邪的情景。根据这一素材，杜困与庄里民间艺人创编了集舞蹈、武术、鼓乐、美术工艺为一体的牛斗虎，成为当地社火中的精品节目，深受群众的喜爱。

牛斗虎舞蹈结构由5人组成，牛头、虎头、牛尾、虎尾各一人，一人演牧童。舞蹈语汇非常丰富，也很讲究，虎的动作有4大式，8小式，24个平仰式。大式有烈虎式、搜山

相去甚远。

明代以后，寺院因年久失修，木塔朽毁，佛殿倒塌，斋田被侵，香火渐衰。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由官绅捐资重修，盖山门正殿，装塑诸佛，坚筑墙垣。康熙五十八年（1719），受斋田免役优待，收回被侵斋田。清同治年间又遭兵燹。此后国力渐微，已无力恢复，殿宇日渐颓败。

清末，正殿再次坍塌，僧人将神龛移至寺后砖砌窑洞事佛。窑洞共三面，青砖砌表，洞前有东西厦房各三间，正洞中供西方三圣像三尊，高约七尺。1955年，庄严寺与大兴善寺等寺组成佛教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僧人并入大兴善寺。寺址所存的牌楼、法堂、石碑、石柱、香炉等物，由市园林局木塔寺苗圃代管。

2009年9月，西安市高新区管委会在原庄



清康熙年间遗留下来的山门

严寺遗址的基础上建设了木塔寺遗址公园。公园以清康熙年间遗存的山门遗址、原大殿左右列植的两株古龙爪槐和寺址北端三间雕花青砖砌筑的窑洞式后殿及总持、庄严二寺木塔遗址为基础，以传统园林为表现形式，并合理增加了许多具有时代感的现代元素构成。既保存了遗址和文化，也提升了周围的大环境。

式、望山式和捕食式。刻画老虎的勇武、精明和顽皮情态。牛也有回头望月、裂叉舔背、吃草、缩叉、挖耳等36式，将牛的稳健、壮美和朴实顽强描绘得惟妙惟肖，变现的淋漓尽致。真是虎有虎势，牛有牛劲，童有童趣。

牛斗虎舞蹈的特征：1. 舞蹈《牛斗虎》是集民间舞蹈、中华武术、鼓乐、民间美术工艺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从而使舞蹈更加鲜活，更加精彩；2. “牛斗虎”虽然是表现动物之间的争斗场面，但它是劳动人民“托物言志”寄物抒情，主题以小见大、编舞语汇明确，层次清晰，表达了恶不压正，正不怕邪，弱不惧强，敢于拼搏，战而能胜的思想内涵；3. “牛斗虎”演出多在夜间室外场地，灯笼环绕四周，气氛冷清森肃，加上音乐以打击乐锣鼓敲击，激越昂扬配以松香之烟火开场，猛虎下山其势如迅雷不及掩目，张扬跋扈，顿然把观众的情绪带入一个紧张严峻的氛围之中。牛虎争斗，动作优美，刚柔并济，情节逼真，动作细腻，栩栩如生，扣人心弦，使原始朴素的民间艺术得到了较高的舞台升华，具有浓烈的艺术感染力。

牛斗虎舞蹈的主要价值：1. 学术价值。舞蹈艺术实质是人们劳动生活的产物，“牛斗虎”是土生土长的一种民间舞蹈，它源于生活，贴近生活，它的历史传承特征、编排的离奇故事和舞蹈的高超技术，在其它地区实属罕见，发掘、抢救和保护“牛斗虎”，对于丰富民间舞蹈和发展舞蹈事业都有特殊的意义；2. 社会价值。“牛斗虎”是劳动人民在农忙闲暇之余，喜庆丰收、节日庆典举办的自娱自乐的活动形式，挖掘、保护“牛斗虎”，对于周至县精神文明建设，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综合素质，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将产生重要的作用。

该舞蹈1959年在宝鸡地区文艺汇演中获一等奖；1987年获全国舞蹈大赛二等奖和编导二等奖；参加西安市古文化艺术节获一等奖，在关中地区享有很高的声誉。2007年，《周至牛斗虎》被分别列入陕西省、西安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赵明被命名为陕西省、西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古法斫琴



作为“琴棋书画”四艺之首，古琴历来被文人士大夫视为修养与身份的象征。

古法斫琴指采用唐代传统方式精工细作的一种古琴制作工艺，它是融汇文化、艺术、音律、美学修养和木工、漆工等技术于一体的综合技艺。琴界素有“善弹者善斫”之称，意为传统琴师在琴艺修养中斫琴是必修课程之一。

历史上许多著名琴师同时也是斫琴大师。

古法斫琴是一种完全沿用唐代时期古琴的纯手工制作的技艺，每张琴经过选料、定式、造型、槽腹、辨音、微调、定音、合琴、配件、靠木漆、裹夏布、上粗胎、上中胎、上细胎、粗打磨、中打磨、精打磨、试音、调厚薄、再定音、上面漆、推光、上弦等几十道传统工序，历时两年多方能完成。

唐代是当时世界的强国之一，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在古琴艺术的发展方面涌现了一大批技艺精湛的专业琴家，如赵耶利、董庭兰、薛易简、陈康士、陈拙、颖师等，这些琴家不仅以其高超的演奏技术获得当时人们的尊重，而且在搜集、整理、加工传统曲目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唐代琴曲艺术的提高也推进了造琴工艺的发展。从文献记载和传世实物来看，隋唐时期在古琴的斫制工艺上，已达到相当的高度。唐代最为著名的斫琴家是四川雷氏家族，他们所制的琴被人们尊称为“雷琴”“雷公琴”“雷



氏琴”。雷家世代造琴，有名的琴匠有雷威、雷俨、雷绍、雷会、雷珏、雷文、雷迅、雷霄等。今故宫博物院所藏唐琴“九霄环佩”“大圣遗音”“飞泉”，中国艺术研究院所藏“枯木龙吟”琴等，经专家考证，皆为雷琴。其他有名的唐代斫琴名家还有郭谅、沈镣、张越、冯昭等。

据《琴史》载：“勉有所自制，天下以为宝，乐家传响泉、韵磬皆勉所爱者。或云，其造琴，新旧桐材扣之合律者，裁而胶缀之，号百衲琴，其响泉韵磬，弦一上十年不断，其制器可谓臻妙，非达于琴者，孰能与于此乎”。

古法斫琴以工艺复杂、时间漫长、对原材料苛刻而著名。每张琴均采用百年以上古旧庙梁为原材料，使用秦岭产苧麻通体包裹，梅花鹿角霜调和秦岭野生漆作为灰胎，遵照传统工序，耗时两年以上斫制而成，其音色高古、通透、圆润、余韵悠长，低音醇厚、高音清越。可与唐宋老琴媲美，是北方古琴的典型代表。

2016年1月，西安市新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古法斫琴技艺入选陕西省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陕西省长安古琴艺术研究院理事长昭闻，是古法斫琴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其古琴艺术研究院注册学员300余人，他制作的“昭闻琴”或“程琴”遵照传统工序，音色高古、通透，可与唐宋老琴媲美，是北方古琴的典型代表。

白杨寨村

位于西安市以东5公里的浐河西岸，北邻田家湾，南邻月登阁，东紧靠史家湾。属于西安市雁塔区等驾坡街道。

明洪武年（1368）朱元璋称帝后，将“广积粮，高筑墙，缓称帝”的九字方针作为建国方略，解放劳力，垦荒种地，囤积粮食，

充盈国库。朱元璋的二子朱棣将封地奉元府改名为西安府，遵照朱元璋的九字建国方略，在西安设置很多粮库，白杨寨是其中之一。粮库的粮秣官朱xx死后葬在本村（白杨寨二组机井边），有碑文为证。1402年朱元璋第四个儿子朱棣称帝把朱元璋的九字建国方略更加发扬光大，并派军队驻守，驻军守将韩祿死后葬在本村桑树坡（现在三组三路壕崖东边），有碑文为证。当时粮库边有大涝池两个，东边涝池栽有大叶白杨树一棵，长得很高大，最后以大叶白杨树为据正式定名白杨寨村。

村子原分为两寨。南寨主要居住村民，有很多皂角树，可供人们洗涤用；北寨是粮库和驻军，南北断隔，直到1952年才打通了南北二寨，统一了白杨寨村。村有两条官道直通西安城，浐河以东各县去西安，该村是必经之路。

土地改革时，全村700余人，人均土地7.5



亩。后来，东方厂、五二钢厂等征地约1000亩。1956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牲口、土地入社，一平二调，300余亩土地被无偿调走。实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新规划（同时实行土地、牲口无偿调拨，即一平二调）。同年有线广播开通。1957年撤销长乐区，归属灞桥区。1958年开展除四害（灭蚊子、灭苍蝇、灭老鼠、打麻雀），同年9月成立人民公社，10月大炼钢铁，各小队成立食堂，吃饭不要钱。

1970年毛主席提出农业“学大寨”“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开展了平整土地，修渠打井，实现水浇灌。1978年给各个时期的冤假错案实行平反。1982年土地下户，解决了人民的温饱。1988年等驾坡乡人民政府改制为雁塔区等驾坡街道办事处。

（选自《西安村落记忆》）





马腾空村

位于长鸣路东，月登阁村南，距东等驾坡村3公里，属西安市雁塔区等驾坡街道。该村地势西南高，东北低，扼于浐河西岸，地处险要道口，是历代兵家要地。现设8个村民小组，1234户、2852人，耕地555亩。

据《资治通鉴·晋孝武帝记》：“姚登自曲牢向繁川，军于马头原。”《晋书·姚萇载记》：“萇于登战，败于马头原。”唐代在村东原下筑坝，逼水上原，流入龙首渠后分两股进入兴庆宫和禁苑，是长安城市供水渠道之一。唐《法灯塔铭》和宋《长安志》已称为马头控。《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记为马腾空。1980年，改为马腾空。相传，东汉时期，有一帝王狩猎“引驾回”（现长安区引镇），经过村子时，恰逢王莽带大队人马追赶刘秀，气势宏大，惊动了浐河东岸的鲸鱼，该鱼游离而去，此时山崩地裂，惊天动地，帝王坐骑受惊，腾空而起，故因此而得名。又传，古代以塬崖似马头而得名。

新中国成立前，村民祖辈的栖身地几历沧桑、几多磨难、几度被毁、几次迁徙，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多数村民仍然蜗居在浐河西岸的马头塬坡的阴暗窑洞里，即便是几户大户住宅也不过是几眼地势稍好的砖砌窑洞，外加几间砖木结构的“三合头”组成的“四合院”。新中国成立后，住宅条件逐步得到改善，开始告别窑洞，重返塬上重建家园。

今天，一排排楼房，整齐划一，一户户住宅，二层、三层、四层……，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等布局合理、科学，电视、电话、热水器等基本设施齐全。



过去村民饮用浐河或浐河边蓄水池水，或挖井取水。随着浐河慢慢成为季节河后，饮用水矛盾十分突出，村里通过实践改水工程，新打饮用水井三眼，自来水入户率达100%，而且水质、水压、水量、安全保障条件均达标。

1964年，村里

开始通电，改变了农村用油灯的历史。当时电网密度小，容量也小，除用于照明外，仅仅能带动少量电动水车及副产品加工，磨面等，而且经常停电。1976年后，随着市政建设的力度加大，高压线路变压器数量的增加，村子配备了电管员，并于1992年后新增了变压器，新增电容500千伏安。2008年又开始10千伏电力电缆埋地铺设。

村内的道路已今非昔比，再也不是“晴天高低不平，雨天洼水烂泥”，水泥硬路连接每家每户，村级主干道路宽8米，单侧布置路灯近200盏及电线杆，西接长鸣路，北接东三环，中接田马路。

20世纪80年代后，通信建设很快，电缆、光缆相继通村，家家通电话，户户有电视、互联网宽带、有线电视网络……。

原来村民都生火做饭，使用农家柴禾土灶。1980年后村民做饭基本告别土灶，如今家家都用煤气或电做饭。

该村历史上是天然的绿化村，自古以来浐河畔和马头塬的多种花草树木扎根落户，随着村周边地域不断城市化和村本身的拆迁改造，绿色渐渐减少。对此，村里带有强制性地，在村道路两旁和田头乡路边栽种女贞、柳树、冬青等4000余棵树，绿化面积达40%；强制性要求村民保护树木，并鼓励村民在楼前院内养花草、栽盆景。

环境卫生方面，原来是“拉尿用土盖”“鸡粪随脚踩”等；后经1952年的“爱国卫生运动”，1957年的“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振奋精神、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开展；以及1978年“城市重点整治卫生，农村管好水、粪，标本兼治”的落实，使村民的环境保护、环境卫生治理意识有了较大提高，环境也得到明显改善，多次被授予“文明村”“卫生先进村”称号。

（选自《西安村落记忆》）

史家湾村

位于浐河西岸，东有白鹿原，西有乐游苑，两原夹一川，咸宁东路直通浐河边，向南就是田、史二湾。因为史家湾在田家湾村南，两村相连，难分村畔，所以人称“田史二湾”。属于西安市雁塔区等驾坡街道。7个村民小组，680户，农业人口2230人，非农业人口860人，村民宅基地面积360亩，耕地1000

亩，是种菜、种粮、旅游观光、仓储物流、兴办实体的好地方。

传说2000年前，史家湾曾居住过一代皇亲。清代中期，由于村民“男善、女贤”，周围村庄颂村名为“兴贤湾”。清代末期出了一史姓官吏后，村名又改回史家湾。

据传说，西汉时期这里就是一个最为美





丽的村庄，有近10座庙宇环村，河清水秀，景色迷人。距离乐游原所在地“秦杜县故城”不远。川塬环抱，花繁树茂，风景秀丽，为汉长安城南乐游圣地，刘询在史家湾习文练武，经常到杜县塬上游玩，酷爱这里的一方山水。当皇帝后把自己初陵选在此，这就是2000多年来杜陵及杜陵塬的来龙去脉。

据村里老人肖全恒、肖全武、李明昌回忆，民国初期，史家湾一片林阴，有七棵腰围在7—8米左右的大白杨树，高15—18米，树冠都在160—200平方米左右，从小庙（马王庙）到三官庙前从东到西排列，好像北斗七星落在水渠岸边，风吹树叶响，好像在欢迎远方的亲人和下地干活回来的村民。盛夏季节，人们都喜欢在树下纳凉，连吃饭都端着老碗在树下边吃边乘凉，来往路过的客商，无不停脚歇凉。每棵大树都有几个老笼大的鸟窝鸟巢。村中有3条小渠向北流淌，小鱼小虾在渠里嬉戏，小孩子在水里逮螃蟹，抓黄鳝，妇女在渠边石头上洗衣服。

西安市民赞扬特产菜编了一个顺口溜，长乐坡的莴笋冷壮、草滩的红萝卜碾杠、史家湾的蒜苗最棒，请客设宴没有史家湾的大葱不上——史家湾的蔬菜早已成为市民心目中不可缺少的美味菜肴。一是由于菜全部用的优良品种，二是施肥全部施的旧墙老坑土、油渣、农家肥；三是浇菜用的是泾河引来的清泉水，所以生产出的蒜苗成了“一家炒蒜苗百家香，闻到香味口水淌”；史家湾的大葱包饺子、包子不坨，做臊子不沉锅底，成为西安市的驰名蔬菜。

清末民初年间，史家湾就是一条从商州、蓝田通向西安的主要官道，从三殿过河向西过

白观音菩萨庙，到老官庙、樊家什子、二郎庙向西上寨子坡，过店子门向西路壕沟，到狗碑子（韩森寨）向西金花落，过仁后庄到东关新梢门进城。

民国28年（1939）2月，国民党警官学校西北分校警官训练班在史家湾成立。校址老官庙，校长蒋介石兼，主要培训警察局正副局长及训官（所长），培训期1年，直到1949年3月随蒋介石迁到台湾。为建警官学校，史家湾9座庙宇被毁之一旦，还把村里的13棵苍天大树毁掉。人们给警官学校送了一首歌：“警官学校，警官学校，白天睡觉，晚上拆庙。”最后在群众的呼声下，1943年警官学校在郭家祠堂为史家湾村建了一个“立行小学”来弥补。

1940年以前，村中9座庙宇香火不断，香火最旺的是肖家门前的三官庙，最大的是村北头的玉皇庙和什字东的老关庙。三官庙每年农历七月十一是庙会，老人们把这个会叫慰面会。慰面是一种过水的凉面，调上各种调料，吃起来香、凉、辣、麻、酸，味道奇特。每年七月十一都要搭台唱戏，十里八乡的香客及四面八方的亲友都前来上香看戏。庙宇分上殿和前殿两座，院中有柏树两棵，庙门口偏东有石碾子，门前是一条东西大路，路北有条水渠，渠边从庙前到小庙有7棵参天大白杨，直径在八尺左右，庙前那棵杨树，树冠有180平方米以上，庙宇前殿在大白杨树阴下。庙西北角墙外有棵大皂荚树，树身直径在3尺以上，树冠有80平方米，笼罩着庙宇的上殿，走进三官庙如进入仙境一般，进庙烧香的人如潮水一样个个争先恐后。

玉皇庙在村北头坐北向南，门前有个涝池，东墙外有条水渠。庙宽5丈，南北进深50



丈，庙门一间，进院有山门5间，山门内有塔楼，两边花池，东西两侧各有三间神庙，东边供奉的黑虎神，西边供奉送子娘娘佛像，最后边大殿供奉玉皇大帝。殿内仙鹤童子两边八仙过海，墙壁的油彩绘画如同真神一般，玉皇金身佛光普照，院内的香炉石兽、石碑都是千年以上的遗产。另外还有赵家门前的菩萨庙，什字角的二郎庙、郭家窝窝的老爷庙，人们有顺口溜：“史家湾两头翘，中间夹个老爷庙。”什字东北角的二郎庙，牛家台台开光菩萨庙，肖家坡下向南是灯台，老官庙被警官学校做了教室，庙内的神像文物全部破坏。1953年全村人又集资，用被破坏的玉皇大殿剩余残迹在老官庙大殿前修了一个六丈宽台口、五丈的入深，台高五尺的大戏楼，宏伟壮观，当时是西安东郊最大的农村戏台，“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拆除。村外向东是白观音菩萨庙遗址，人们为了怀念和对佛教活动的热爱，集资修了白观音菩萨庙，近十年来香火不断。

20世纪80年代前，浐河连遭三次特大洪水后，在村南河坎下冲出了一座庙基，冲出了几百块石条、石兽、石像、石柱。六角石柱上刻满文字，肖思性捡了一只金灿灿的鎏金老虎，交给了省博物馆收藏，石条石块被村民拉回家盖房做了地基。据老人分析，可能是座龙王庙。

1949年成立农会，1950年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1951年11月开展复查工作，进行查田定产，完善土改工作中的遗留问题。1953年搞普选，搞人口普查，选人民代表。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开始了大跃进和食堂化，当时村民用这样一句话形容“开始吃的好，中间吃的差，最后喝不上稀啦啦”。

1965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造成

了村子第二次文化遗产流失，文物受到创伤。

1968年成立了武装基干民兵连，由兰州军区指派教练员，长期进行劳武结合。白天参加劳动，不误工，晚上组织全连民兵边训练边修全村道路，联系钢厂、东方厂、秦川厂的炉灰、沙子铺半尺厚的路面，每天加班到半夜12点，用半年多时间把全村的大街小巷全部修完，在当时道路环境最好，多年被评为先进村。《陕西省民兵建设》杂志每期都表彰史家湾民兵连先进事迹。

近年来村里先后对所有道路进行路面硬化，兴修南、北、中三条出村路，修建完善全村饮水工程，打深井三眼，修水塔两座，完成村内5000多米排污工程。修建了村有史以来具有标志性建筑“史家湾村”门楼三座，修建18.2亩的健身运动广场、停车场及农贸市场，引进708路中巴车。村民的房屋出租率大大提高，各种小型生产加工厂、仓储物流的形成，为繁荣村经济提供有利条件。到2010年，人均年收入达8670元。

这里人杰地灵，名人辈出。民国时期黄埔军校毕业生有杜印生（少将军衔）、徐志鸿；抗日功臣肖全吉；抗美援朝英雄李秋年、李振星、攀明信；新疆军区师长李秀武；西安市妇联副主任樊小曼；西安市人民银行主任李明信；西安市乳品业创始人，红旗厂、红星厂厂长李维和；大华纱厂厂长肖金生；西北国绵五厂党支部书记孟恩宽；银川市供电局局长李恩均；西安市劳模、省建五公司（铁人）李文艺；从教的有民国初期史家湾第一任办学创始人、36社绅士徐作董老先生（八先生），西安思源学院书法家肖建安，农民画家郭德海等。

（选自《西安村落记忆》）





对 雪

(唐) 杜 甫

战哭多新鬼，愁吟独老翁。
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
瓢弃尊无绿，炉存火似红。
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

【注释】

愁吟：哀吟。唐薛能《西县作》诗：“从此渐知光景异，锦都回首尽愁吟。”

回风：《楚辞·九章·悲回风》：“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

愁坐：含忧默坐。唐李白《酬崔五郎中》诗：“奈何怀良图，郁悒独愁坐。”书空：是晋人殷浩的典故，意思是忧愁无聊，用手在空中划着字。唐李公佐《谢小娥传》：“余遂请齐公书于纸。乃凭槛书空，凝思默虑。”

【赏析】

此诗是杜甫在唐肃宗至德元载（756）冬陷居长安时所作。杜甫在写这首诗之前不久，泥古不化的宰相房琯率领唐军在陈陶斜和青坂与安禄山叛军展开大战，大败，死伤几万人。长安失陷时，诗人逃到半路就被叛军抓住，解回长安。诗人也设法隐蔽自己，得以保存气节；但是痛苦的心情，艰难的生活，仍然折磨着诗人。

此诗一、二句中“战哭多新鬼”，正暗点了这个使人伤痛的事实。房琯既败，收复长安暂时没有希望，不能不给诗人平添一层愁苦，又不能随便向人倾诉。所以上句用一“多”字，以见心情的沉重；下句“愁吟独老翁”，就用一“独”字，以见环境的险恶。

三、四句中“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正面写出题目。先写黄昏时的乱云，次写旋风中乱转的急雪。这样就分出层次，

显出题中那个“对”字，暗示诗人独坐斗室，反复愁吟，从乱云欲雪一直呆到急雪回风，满怀愁绪，仿佛和严寒的天气交织融化在一起了。

五、六句中接着写诗人贫寒交困的景况。“瓢弃樽无绿”，写出了诗人困居长安，生活非常艰苦。在苦寒中找不到一滴酒。葫芦早就扔掉，樽里空空如也。“炉存火似红”，也没有多少柴火，剩下来的是勉强照红的余火。这里，诗人不说炉中火已然燃尽，而偏偏要说有“火”，而且还下一“红”字，写得好象炉火熊熊，满室生辉，然后用一“似”字点出幻境。明明是冷不可耐，明明只剩下的是炉中只存余热的灰烬，由于对温暖的渴求，诗人眼前却出现了幻象：炉中燃起了熊熊的火，照得眼前一片通红。这样的以幻作真的描写，非常深刻地挖出了诗人此时内心世界的隐秘。这是在一种



观 猎

(唐) 王 维

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
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
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
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注释】

渭城：秦时咸阳城，汉改称渭城，在今西安市西北，渭水之北。

新丰市：故址在今西安市临潼区东北，是古代盛产美酒的地方。

细柳营：在今西安市长安区，是汉代名将周亚夫屯军之地。《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以备胡。”借此指打猎将军所居军营。

射雕：北齐斛律光精通武艺，曾射中一雕，人称“射雕手”，此引用其事以赞美将军。

【赏析】

诗题一作《观猎》。从诗篇遒劲有力的风格看，当是王维前期作品。诗的内容不过是一次普通的狩猎活动，却写得激情洋溢，豪放有力。全诗共分两部分。前四句为第一部分，写射猎的过程；后四句写将军傍晚收猎回营的情景。至于其艺术手法，几令清人沈德潜叹为观止：“章法、句法、字法俱臻绝顶。盛唐诗中亦不多见。”（《唐诗别裁》）

诗开篇就是“风劲角弓鸣”，未及写人，先全力写其影响：风呼，弦鸣。风声与角弓（用角装饰的硬弓）声彼此相应：风之劲由弦的震响听出；弦鸣声则因风而益振。“角弓鸣”三字已带出“猎”意，能使人去想象那“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射猎场面。劲风中射猎，该具备何等手眼！这又唤起读者对猎手的悬念。待声势俱足，

渴求满足的心理驱使下出现的幻象。这样来刻画严寒难忍，比之“炉冷如冰”之类，有着不可比拟的深度。因为它不仅没有局限于对客观事物的如实描写，而且融进了诗人本身的主观情感，恰当地把诗人所要表现的思想感情表现出来，做到了既有现实感，又有浪漫感。

七、八句中，诗人再归结到对于时局

的忧患。至德元载（756）至二载（757），唐王朝和安禄山、史思明等的战争，在黄河中游一带地区进行，整个形势对唐军仍然不利。诗人陷身长安，前线战况和妻子弟妹的消息都无从获悉，所以说“数州消息断”，而以“愁坐正书空”结束全诗。这首诗表现了杜甫对国家和亲人的命运深切关怀而又无从着力的苦恼心情。





才推出射猎主角来：“将军猎渭城”。将军的出现，恰合读者的期待。这发端的一笔，胜人处全在突兀，能先声夺人。

渭城为秦时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其时平原草枯，积雪已消，冬末的萧条中略带一丝儿春意。“草枯”“雪尽”四字如素描一般简洁、形象，颇具画意。“鹰眼”因“草枯”而特别锐利，“马蹄”因“雪尽”而绝无滞碍，颌联体物极为精细。三句不言鹰眼“锐”而言眼“疾”，意味猎物很快被发现，紧接以“马蹄轻”三字则见猎骑迅速追踪而至。“疾”“轻”下字俱妙。两句使人联想到鲍照写猎名句：“兽肥春草短，飞鞚越平陆”，但这里发现猎物进而追击的意思是明写在纸上的，而王维却将同一层意思隐然句下，使人寻想，便觉诗味隽永。三四句初读似各表一意，对仗铢两悉称；细绎方觉意脉相承，实属“流水对”。如此精妙的对句，实不多见。

以上写出猎，只就“角弓鸣”“鹰眼疾”“马蹄轻”三个细节点染，不写猎获的场面。一则由于猎获之意见于言外；二则射猎之乐趣，远非实际功利所可计量，只就猎骑英姿与影响写来自佳。

颈联紧接“马蹄轻”而来，意思却转折到罢猎还归。虽转折而与上文意脉不断，自然流走。“新丰市”故址在今陕西临潼县，“细柳营”在今陕西长安县，两地相隔七十余里。此二地名俱见《汉书》，诗人兴会所至，一时汇集，典雅有味，原不必指实。言“忽过”，言“还归”，则见返营驰骋之疾速，真有瞬息“千里”之感。“细柳营”本是汉代周亚夫屯军之地，用来就多一重意味，似谓诗中狩猎的主人公亦具名将之风度，与其前面射猎时意气风发、飒爽英姿，形象正相吻合。这两句连上两句，既生动描

写了猎骑情景，又真切表现了主人公的轻快感觉和喜悦心情。

写到猎归，诗意本尽。尾联却更以写景作结，但它所写非营地景色，而是遥遥“回看”向来行猎处之远景，已是“千里暮云平”。此景遥接篇首。首尾不但彼此呼应，而且适成对照：当初是风起云涌，与出猎紧张气氛相应；此时是风定云平，与猎归后踌躇容与的心境相称。写景俱是表情，于景的变化中见情的消长，堪称妙笔。七句语有出典，《北史·斛律光传》载北齐斛律光校猎时，于云表见一大鸟，射中其颈，形如车轮，旋转而下，乃是一雕，因被人称为“射雕手”。此言“射雕处”，有暗示将军的膂力强、箭法高之意。诗的这一结尾摇曳生姿，饶有余味。

这首诗很善于运用先声夺人、侧面烘托和活用典故等艺术手段来刻画人物，从而使诗的形象鲜明生动、意境恢宏而含蓄。诗写的虽是日常的狩猎活动，但却栩栩如生地刻画出将军的骁勇英姿，感染力。在这首诗中王维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却是渴望效命疆场，期盼建功立业。

综观全诗，半写出猎，半写猎归，起得突兀，结得意远，中两联一气流走，承转自如，有格律束缚不住的气势，又能首尾回环映带，体合五律，这是章法之妙。诗中藏三地名而使人不觉，用典浑化无迹，写景俱能传情，三四句既穷极物理又意见于言外，这是句法之妙。“枯”“尽”“疾”“轻”“忽过”“还归”，遣词用字准确锤炼，咸能照应，这是字法之妙。所有这些手法，又都能巧妙表达诗中人生气远出的意态与豪情。所以，此诗完全当得起盛唐佳作的称誉。



螳螂捕蝉

解释：蝉——知了。螳螂正要捉蝉，却不知黄雀在它后面正要吃它。比喻目光短浅，只想到算计别人，没想到别人在算计他。

成语出自汉·刘向《说苑·正谏》：“园中有树，其上有蝉，蝉高居悲鸣饮露，不知螳螂在其后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蝉，而不知黄雀在其傍也。”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经常进行兼并战争。有一次，吴王准备进攻楚国。他召集群臣，宣布了准备攻打楚国的决定。大臣们一听此消息，就低声议论起来，因为大家都知道吴国目前的实力还不够雄厚，应该养精蓄锐，先使国富民强，之后才能作别的打算。

吴王听到大臣们在底下窃窃私语，似有异议，便厉声制止道：“你们不要议论了，我决心已定，谁也别想动摇我！倘若有谁执意要阻止我，我决不轻饶！”

众大臣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乱说一句。当时朝堂上有一位正直的年轻侍从，退朝后心中仍旧无法安宁，他觉得吴王这样做是不是太草率了，但是又不知道怎样才能说服吴王，使其放弃攻打楚国的想法。于是这个侍从在吴王的后花园内踱来踱去地想办法，就在此时，他的目光无意中落到了树上一只蝉的身上，他立刻就有了主意。

第二天天刚亮，这个青年侍从又来到了吴王休息的后花园，他手拿一把弹弓，在树底下转来转去。第三天早晨他又来到树下转悠，第四天、第五天早晨也是这样转来转去的。有人觉得他的行为很奇怪，就把这事告诉了吴王。

第六天早晨，青年侍从又来了，吴王也来了，便问他：“你一连几天早晨来这花园里干什么？瞧你的衣服都被露水浸湿了，你到底要做什么呢？”这个青年侍从手拿弹弓，对吴王轻声说道：“大王，您小声一点。您向树上看，那里有一只蝉只顾着在那里高兴地吸露水，却没有觉察到有一只螳螂躲在他身后，弯着前肢，想要捕捉它呢！”

吴王笑着说：“螳螂捕蝉，这有什么好稀奇的。”青年侍从说：“大王您再看，螳螂一心想捕蝉，但它不知道，还有一只黄雀在它身后，正伸长脖子，瞪着眼睛，想啄它呢。”

吴王说：“这又说明什么呢？”

青年侍从将手中的弹弓搭上泥丸对准黄雀，然后说：“那只黄雀只顾着看着螳螂，却不知道我的弹弓已经对准它了。蝉、螳螂、黄雀都只看到自己眼前的利益，却没有想到自己身后的危险啊！”

吴王听到这里，猛然醒悟了，他明白了青年侍从的用意，遂取消了攻打楚国的计划。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举行“坚定文化自信 讲好西安故事”调讲会

为了贯彻落实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坚定文化自信讲好陕西故事”活动的通知》精神，10月20日，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在全市范围内组织讲好西安故事调讲会。西安市地方志办副主任姚敏杰、张帆，副巡视员王莹及各处室负责人、区县相关人员近30人参加本次活动，调讲会由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张帆主持。

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坚定文化自信 讲好陕西故事”活动的通知》下发后，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高度重视，立即制订实施方案，成立讲好西安故事领导小组。并向各区县地方志办公室转发通知，要求依托地方志横陈百业、纵贯古今优势，发掘历史智慧，讲好本区县故事，活动得到各区县积极响应。新城区、莲湖区、临潼区、蓝田县、周至县等区县积极组织本区县调讲，经过初步筛选，选拔优秀选手参加西安市调讲。本次调讲，莲湖区讲述碧血铸英魂，再现杨虎城将军抗日却无力救国的英雄情怀；临潼区讲述年轮的力量，千年古槐静默着见证一段段生动的历史；蓝田县选送齐氏家风家训传大义，讲述齐氏家风家训作为中华民族的一脉传统文化精髓，源远流长，惠泽疆土；周至县选送千年名镇古楼观，讲述楼观镇源远流长，每一村、每一地都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新城区民间艺人以快板艺术形式讲述了新城区永乐坊特色饮食小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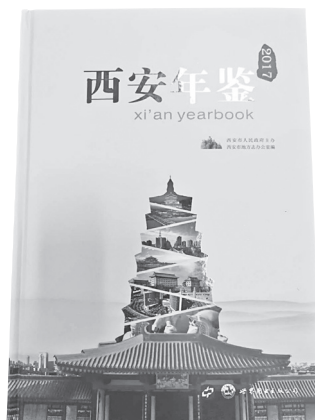
张帆副主任最后充分肯定了区县领导对此次活动的高度重视，赞扬了选手们的现场良好表现，并指出通过选手们的精心准备，对本地区优秀历史文化的发掘，向大家讲述了一个个守护历史根脉、传承现代文明的西安故事，这些故事地域特色浓郁，弘扬了社会正能量，展示了当代西安风采。



《西安年鉴2017》正式出版发行

2017年11月，由西安市人民政府主办、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西安年鉴2017》正式出版发行。该书为《西安年鉴》系列第二十五卷，由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出版，共有页码464页，总字数100万字；有内文插图119张；有彩页30面，照片90张；

有类目38个、分目177个、二级分目16个、条目1590个。《西安年鉴2017》以翔实的内容、精美的图片和装帧设计，图文并茂、客观地记录了2016年西安地域内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为社会各界读者了解和研究西安提供基本信息资料。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官方网站也将发布年鉴的网络版，读者可随时免费下载浏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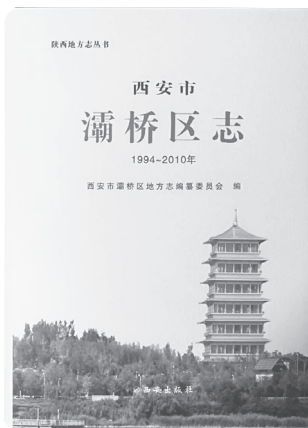


《灞桥区志（1994—2010）》正式出版发行

2017年9月，西安市灞桥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灞桥区志》（1994—2010）由西安出版社正式出版。该志是2003年编纂出版的《灞桥区志》的续志，在前志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记载了改革开放时期，灞桥区坚持生态立区，在经济、社会发展诸多方面取得的新成就，续写了灞桥的文明根脉和灞桥人民的新奉献、新业绩。

《灞桥区志（1994—2010）》编纂自2003年9月始，经制定规划、设计篇目、培训人员、收集资料、精心编纂、征求意见等环节，其间六易其稿，终得杀青。2014年3月通过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复审，2015年5月通过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终审。

《灞桥区志（1994—2010）》全志共设建置区划、自然地理、人口、环境保护、城乡建设、交通运输邮政、农林牧渔业、水务、工业、招商引资、商贸服务业、旅游、财税金融、经济综合管理、中国共产党灞桥区地方组织、地方国家机关、政协民主党派群团组织、公安司法行政、民政信访、军事、劳动人事和社会保障、教育、科技、文化遗产、卫生体育、社会、人物、专记28个专业篇目。另设凡例、总述、大事记等，其中附录包括《前志》勘误、《前志大事记》补遗、1994—2010年文献选录、索引等内容。全志设类目110条，条目432条，子目846条，350幅历史和当代各类图照。





编者按：由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编写的《西安史话》出版后，“社科文献网”“华商网”“西安政务信息”“西安新闻网”“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报”先后报道，引起较大社会反响。一些学者、作家也对此书进行评论，这里我们选取几篇以飨读者。

古都新笔：《西安史话》

王茂林

从100多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蓝田猿人，到6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半坡村，西安的建城史已有3000多年，众多王朝在此建都，历时1100多年。“秦中自古帝王州”，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浩瀚的文物古迹遗存使西安享有“天然历史博物馆”的美称。秦始皇兵马俑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是最早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遗迹，西安古城墙是至今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城墙遗址。厚重的历史文化，积累出厚重的西安人。

关于西安的文化历史，不说卷帙浩繁，也是琳琅满目，如何在众多的写西安历史文化的文字里提纲挈领，既照顾到大多数不了解西安文化渊源的外地读者，又简明扼要地提炼西安主题文化要点要义，增强本地本土人对西安文化历史遗存的自豪感和珍惜感，西安市地方志办的姚敏杰和高长安先生，在短短不到10万字的《西安史话》里，达到了这个要求。

《西安史话》的八个章节，除过西安的

区位建制和帝都历史沿革，重点是《中华文明摇篮》和《历史博物馆》《宗教圣地》三个章节，这样的详略分布，我以为是很正确的。世界文化看中国，中国文化看陕西，陕西文化看西安。西安是中华文化的根系所在。《历史博物馆》里陈述的陕西历史博物馆、秦始皇陵博物馆、汉阳陵博物馆等，具为西安代表性文物集聚地，通过参观这些博物馆，能够深刻了解在这块地域上中华文明的衍变和新生。

《西安史话》在内容的选择取舍上删繁就简，以点成线，以线成面，既突出了西安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节点和亮点，又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西安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完整性。西安地方志办公室作为地方志工作者的栖身机构，其扎实的文字功底和求实求真的工作态度，决定了编著者认真负责的态度。

西安是中国文化的“主题公园”。西安城市沉淀下来的是周秦汉唐文化的精髓，并深深烙印在西安市民的内心深处。任何一个作家几



乎都难以穷尽古都西安的城市文化精神风貌。这主要是因为，西安已经超出了一般城市的概念，她不仅是西安人的西安，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世界的西安。

西安是一座有着厚重历史与时代律动的城市，一座有着无与伦比辉煌和无量发展前景的城市，一座蕴含丰厚文化内涵与精神特质的城市。那些承载着西安文化底蕴的半坡遗址、秦兵马俑、大雁塔、明城墙等不但是西安的名

片，更是西安城市精神的具体体现，它们在提升西安知名度，扩大西安影响力的同时，更是西安城市精神的载体。

《西安史话》无疑加强了我国，乃至世界对西安历史文化的认同，在描摹西安的众多文本里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作者：陕西省作协会员，陕西省散文学会乡土文学委员会副主任，《陕西文学》编辑。）

阅尽西安春色 ——《西安史话》读后感

王启新

文友王亚凤赠送给我一本书《西安史话》。捧着这本书阅读，一下子就被它吸引住了。这是一本历史文化普及读本，图文并茂，深入浅出，便于读者阅读理解。它以简练的语言，朴实的笔法，简要全面地介绍了西安的历史演变、文明成果。以西安历史为主线，展现了中华民族5000年的光辉灿烂的文化成果。

《西安史话》书内有八个单元，分为地理建制、古代都城、文化发明、盛名长安、革命事迹、友好交往、历史博物、古寺古庙等。西安具有3100年的建都史，历史悠久，文化丰富。该书将西安的历史事件、人物和文化成果一一记载，叙述全面准确。全书层层递进、步步深入。即有古代文明帝王业绩，又有近代事

迹民族文化。重点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渊源，文化成就，主题是中华民族为了人类的进步文明繁荣，不懈地探索奋斗前进所作出的贡献。全书异彩纷呈，琳琅满目，阅读后让人兴奋激动，又让人沉思和感叹。

西安是一座古城，曾经是长安古都，又被沉沦为西安府。史料丰富，繁杂多变，这本文书记载西安的历史，从古至今，浩瀚复杂，却能有有条不紊地表述出来，叙述人物、事件、公正、客观、全面、准确。只有从事地方志工作的同志才能写得这本书。他们长期从事西安地情资料研究分析，具有认真深入研究社会的科学态度，深厚的史书写作功底，并且对西安各方面的情况十分熟悉。如果不是他们，由几个



文化界杂家来写，很难写出这本书，即使写出来，也不能达到这样的质量，做到客观、准确、全面。《西安史话》是记载西安历史科研价值。

《西安史话》用笔简朴、文笔精炼。多篇文章单独成篇，每辑构成一个单元，全书又浑然一体。这本书文字通顺，语言流畅，没有华丽的辞藻，恣意的铺排，没有渲染的修辞，夸张的粉饰，而是言简意明，朴实无华，可真是质朴中见功力，天然中显风流。这种这种文风写出的文章，让人感到很亲近。这种写法写出来的书，让人感到客观、真实、准确。由此而断定这本书具有很重要的阅读和存留价值。

《西安史话》把西安的历史文化介绍给读者。读着这本书，我们为中华民族自豪，为中华文化而自信。阅读这本书，我们了解了西安，热爱西安。西安是个好地方，好山好水好风光。西安依山傍水，风调雨顺。她是最早的人类文明发源地，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长期成为古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中国十三朝个古都城，是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在这块丰饶又神圣的土地上，发生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出现了众多重要的历史人物。西安蕴藏着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是

中国文化的历史见证，是中华民族自豪的精神坐标。进入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时期，西安是祖国西部重要城市，交通枢纽，又是重要的工业城市，科研教育基地。作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它是我国重要的国际旅游目的地，是中国形象最佳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是最具幸福感的城市。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西安作为“丝绸之路”起点，在对外开放大格局中，肩负这引领历史潮流的重任。西安如同一个春天的世界，五彩缤纷，锦上添花，真是美丽。我们赞美西安，期待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西安建设的更加美好。

当前，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时，《西安史话》这本历史文化书籍出版发行，更显其意义之所在。

（作者：西安市作协会员，未央区政协特邀文史研究员）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精准扶贫石三湾村



12月9日，为认真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扎实推进扶贫工作，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姚敏杰带领机关全体党员在对口帮扶的临潼区小金街办石三湾村开展党员学习活动，宣讲十九大精神，并给该村党员干部赠送十九大精神学习书籍资料。



为了增进与石三湾村村民的感情，培养大家锻炼身体的意识，增强扶贫攻坚效果，12月9日上午，市地方志办与石三湾村联合举办了“活力石三湾”趣味运动会。

市地方志办副主任姚敏杰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宣布趣味运动会开幕，并为获奖选手及参赛选手颁发奖品和纪念品。



“两人三足”比赛



套竹圈比赛



拔河比赛



运核桃比赛



剥玉米比赛



滚铁环比赛



地方志简称『方志』。地方，即地域；志，为『识、记、记述、记载』。『方志』得名，始于西周，《周礼·地官》有『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的记载，汉郑玄注曰：『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方志编修，自此承传不辍。

地方志历经数千年岁月而经久不衰，虽然从形式到内容，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但其宗旨和基本功能却始终如一。这种世界上独有的民族文化现象，既源于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需要，也源于各个地域的人们对自身历史的重视、珍惜、自豪与反思。

西安地方志

主 办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地 址 西安市凤城八路109号
 市政府大院26号信箱
邮 编 710007 电 话 029-86788731
邮 箱 674292617@qq.com
 changannan6861@sohu.com
网 址 <http://www.xadqw.cn>